

北京的都市發展

陳正祥

(一) 位置因素與初期的發展

北京雖也是中國著名的故都之一，但正式成爲全國性的京都，在時間上遠較長安、洛陽、開封爲遲。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最初幾個朝代的京都皆設在長安及其附近。從西漢建國到唐代末年，一千一百多年之間，長安作爲國都先後共達五百八十年（包括西周鎬京及秦咸陽則爲九百五十四年）。後漢遷都洛陽，但仍以長安爲西京。從後漢建國到後唐滅亡，先後九百一十一年之間，有五個朝代合計四百七十七年建都洛陽（包括東周則爲八百六十三年）。從五代後梁到北宋的二百二十年間，另有五個朝代合計二百零六年建都開封（包括戰國時的魏國則長達三百四十八年）。顯而易見，中國古代的國都係逐漸向東遷移。這有國防上和經濟上的雙重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外患，早期多偏在西北；例如漢初的匈奴和唐初的突厥。當時定都長安，是正視敵人，使有所警惕。加上初期關中富庶，灌溉農業發達，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大致符合。經過西漢末年的長期大亂之後，全國的經濟重心已開始東移；中唐以後，長江下游已成爲全國最富庶的地區。¹ 在接受東南地區物資支援這一點上，洛陽和開封的位置都比長安爲便利。

另一方面，唐代末年以後，中國的邊患主要來自東北。契丹崛起於蒙古高原的東

¹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同書卷一六五《權德輿傳》：「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貸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

部，趁五代的衰亂，建立起遼朝；勢力迅速侵入華北，割得燕雲十六州後，北京地區成爲他們南侵的基地。北宋再統一中國，初期的主要敵人仍是契丹；它的建都開封，在國防上是要防禦契丹，在經濟上是利用漕運取得東南的接濟。但北宋建國時無力收復燕雲十六州，形成國防上致命的空缺。女真滅遼建立金朝後，不久便把國都遷到北京（遼國的南京），建爲中都，後來終於滅掉北宋而掩有整個華北。蒙古興起，攻滅金朝，將中都改建爲大都，北京才正式成爲全國性的都城。從元初直到現在，除了兩個短暫的時期外，七百年來北京一直是全國性的首都，這和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密切關係。

北京位於華北大平原的北端，河北省的中部偏北。北面和西面爲連綿不斷的山嶺所環繞，只有少數山口，例如南口和古北口等，才比較容易通過。東面也多是丘陵，都阻礙着交通。只有南面是開廣的平原，瀕臨渤海。但在古代，渤海的海岸線遠在今日海岸以西，而沿海地帶復多沼澤。自古以來，凡從華北平原北上蒙古高原、熱河山地或遼東的，都要經過北京附近，然後再分途通過特定的關口前往。凡從蒙古高原、熱河山地或遼東地區南下中原，都要先經過這些天然關口，到達北京附近，然後再分途南下。因此就地理位置說，北京實爲南北交通必經之路。現在從北京通向包頭、承德、山海關、武漢的幾條主要鐵路，具體地說明了此項事實。而且早在漢唐時代，循太行山麓到遼東的軍事行動，概以北京爲前進基地。隋煬帝和唐太宗的遠征高麗，皆以北京爲屯集軍隊的起點。

「大業七年（611）春，下詔討高麗。……先是，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資治通鑑》一八一）

「貞觀十八年（644）十一月，……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諸軍大集於幽州。」（《新唐書·太宗紀·東夷高麗傳》）

上引所指的涿和幽州，都在今天的北京附近。

長城和大運河，這兩項偉大的中國古代工程，幾乎就在北京附近交會；大運河的北端，距長城不過五十四公里。這也說明了北京位置的重要性，而偉大的工程又給著名的古城增添了光彩。長城保護北京的安全，大運河給它輸送物資，特別是糧食。

北京的原始聚落出現極早，到戰國時代已發展成都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就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這裏的燕是指燕國的國都薊城，北京最初名薊。關於古代薊城的肯定地理知識，大致可上推二千二百年，也就是戰國七雄並立的時代。當時在今日河北省北部的燕國，即爲七雄之一，定都

於薊。²

自從秦始皇滅燕（公元前 226 年），一直到唐代（618—906）末年，前後一千一百多年間，薊城保持為中國北方的局部政治中心和商業城市，並逐漸發展為軍事和交通重鎮。每當華北大平原漢族勢力強盛的時候，常以薊城為經略東北邊外的前進基地。反之每當東北邊外游牧部族勢力膨脹時，中原漢族又必然以薊城作為邊防的中心，抵抗邊民入侵。《元和志》稱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足見當時已頗具規模。

《史記·匈奴傳》：「燕國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秦滅燕後，薊城屬於上谷郡，降格為郡治。西漢在薊城附近設置燕國，先後封臧荼、盧綰為燕王，國除後改稱燕郡。後又設為廣陽郡、廣陽國以及幽州刺史，皆以薊城為治所。故薊城又名幽州。史書上所謂燕薊、幽薊、幽燕，都是指今日的北京。三國、兩晉改廣陽郡為燕郡，仍治薊縣。但幽州在晉代會移治范陽郡（兩漢涿郡的易名），治於涿縣，即今河北省涿縣，在北京城西南六十公里。到拓跋魏（386—556）時，幽州又改以燕郡的薊縣為治所；北齊、後周都沿襲未改。隋代初年廢郡存州，以薊縣為幽州的治所。到煬帝大業三年（607）因為要改州為郡，遂改幽州為涿郡，仍治薊縣。所以隋煬帝在大業七年坐龍舟循通濟渠和永濟渠巡行到涿郡時，³ 所到之處就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一帶在唐代仍稱幽州，到玄宗時改名范陽郡，皆設治薊縣。唐代所置的范陽節度使，也就以薊城為治所。⁴ 五代時後梁、後唐皆仍沿用唐代的舊名，到後晉石敬瑭割

² 1952年在北京外城的陶然亭附近，因疏浚湖泊而出土的燕國文物，明確指示早在兩千數百年前，北京一帶已有一個繁盛的聚落存在。這個聚落，很可能就是燕國的首都薊城。燕國都薊，始見於《史記·燕世家》：「燕王喜二十九年，秦兵拔薊。」《史記·樂毅傳》注引《括地志》：「燕宮在（唐）幽州薊縣西四里。」古薊城的位置，一般認定在北京舊城西南廣安門以西約半公里處。另據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光明日報》所載：最近在北京西南郊的琉璃河鎮附近，發現一批與燕侯有關的西周初期墓葬。根據出土文物分析研究，琉璃河發現的墓葬，基本上都屬於西周早期的成康時期，距今約三千年前。這次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是一件通高六十二厘米，口徑四十八厘米，重四十一公斤半的大鼎，內壁鑄有銘文二十六字，進一步證實了周初燕國的封地就在北京，第一代燕侯為召公奭之子。

³ 《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元年（605）三月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七年二月乙亥（公元 611 年 4 月 7 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

⁴ 在唐代以前，范陽郡本治涿縣。唐代則把設治在涿縣的范陽郡改稱涿州，而又改稱涿縣為范陽縣。於是設治在薊縣的幽州，又有范陽之稱。

幽燕十六州給遼國，⁵ 幽州被遼國定為南京，又稱燕京；並設置析津府，以析津、宛平二縣為府治。於是從戰國燕國到後唐一千四百多年名稱不變的薊縣，受到廢棄。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會同元年（938）升幽州為南京，作為南侵的據點，但並非首都，只是四個陪都之一。當時遼國的首都在臨潢（今遼寧省林西縣東北），稱為上京。另設中京（大定）、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和南京（析津，即今北京），皆為陪都。《遼史》卷四八《百官志》：「遼有五京，上京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隨宜設官，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

「遼太宗會同元年，升幽州為南京，又曰燕京。聖宗開泰元年（1012），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遼古城考》）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晉高祖以遼有援力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為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遼史》卷四〇《地理志·南京道》）

遼國的南京故城，因襲唐代的幽州城。這個城作過節度使的治所，安祿山造反就從這裏發動，而唐末劉仁恭又曾在此割據潛稱大號，想必已經頗具規模。（在遼國和北宋對峙時期，宋人仍稱燕京為幽州城。金滅遼後，曾一度將該城歸還宋朝，宋朝改稱為燕山府。）根據考古記錄，可以推定此一古城在今日北京外城西部廣安門內外之地；⁶ 現在廣安門外的天寧寺塔，便是遼代南京城遺留下來的古建築。宣武門外的法源寺，為遼南京城的著名大寺之一，位於當時南京城的東南角，已從碑刻上證明為唐代的憫忠寺。⁷

⁵ 《遼史》卷四《太宗紀》：「改元會同，是月（十一月）晉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于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

⁶ 隨着工業和市政建設的發展，1966年以後在北京舊外城的西南角，不斷地發現古代文化堆積層、古墓葬和古水井等，說明這裏地下埋藏着成片的古代遺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古代陶井。陶井是利用陶圈防止流沙崩塌，深挖造井的沉井技術；其建造是在地下先挖土井，然後把陶製井圈放入土井內，一節一節地套疊起來砌成筒狀。據近年所發現的六十五座古陶井的出土情況看，可知其分佈地區包括陶然亭、姚家井、廣安門附近、北線閣、白雲觀、宣武區附近和琉璃廠海王村等地；分佈最密集的地點是西便門向東經宣武門到和平門一帶，共佔五十餘座。

⁷ 《大清一統志》卷九《順天府四·寺觀·法源寺》條：「在宛平縣西南，舊為憫忠寺，唐貞觀十九年（645，該年五月拔遼東城），太宗為東征陣亡將士建。寺中有高閣，諺云『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東西有甃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又有唐《重藏舍利記》二，及蘇靈芝行書《寶塔頌》。……雍正十一年（1733）奉勅重修，改今名。」

北京的都市發展

45

宋朝宰相王曾《上契丹事》中說到：「幽州東門內憫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將士所造。」過去在滄鄭王府內發現的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件欽墓志，記載基地在薊縣城東北五里。乾隆年間在正陽門外琉璃廠海王村發現的遼保寧十年（978）李內貞墓志，稱其地為燕京東門外之海王村。此外如《三朝北盟會編》就郭藥師襲遼，由固安渡盧水，奪迎春門，陳於憫忠寺前，也可佐證遼代南京城的東門，係在憫忠寺附近。

「唐幽州藩鎮城，在今城之西南，遼之南京即因之。至金重加增拓，遼元至元間建都城，而故址漸廢。至於元之大都，則今安定、德勝門外，尚為城中地。自明初縮城之北面，而元之規制以改。永樂中重拓南城，又非復明初之舊矣。」（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一）

北京之正式成為皇都，開始於金海陵王貞元元年（即天德五年，公元1153），在滅遼之後二十八年，⁸ 到現在已有八百多年。《金史》卷五本紀：「貞元元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乙卯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當時經過擴建的中都城，規模遠比遼南京城為大（參閱圖一）；中都的東南城角在今永定門火車站西南，東北城角在今宣武門內翠花街，西北城角在今西郊軍事博物館南邊，西南城角在今鳳凰村。

事實上在天德元年（1149），海陵王完顏亮就想遷都；在天德三年作出決定，立即開始營建宮室。但事先曾派遣畫工，到開封去描繪汴京宮室規制。天德五年初步建成，才正式宣佈遷都。

「天德元年海陵意欲徙都於燕。上書者咸言上京臨潢府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赴愬，不如都燕，以應天地之中。言與意合，迺命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左丞蔡松年調諸路民夫築燕京，制度如汴。⁹ 詔曰：燕本列國之名，今立京師，不當稱燕京，改號中都。以析津府為大興府。」（《元一統志》卷一《大都路》）

⁸ 金太宗完顏晟在1125年滅遼，曾將遼南京城局部改建，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金故城考》，有如下一段記載：「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宗望取燕山府，因遼人宮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捕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

⁹ 金中都官闕制度的模仿汴京，是勢所必然的。女真是半遊牧、半農耕的少數民族，文化很落後，而汴京開封在北宋末年，已發展成為全世界最燦爛的文化中心之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引《金圖經》：「宣陽門正北曰歲廡，東西對焉；廡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說明了此一事實。

「(天德)三年四月丙午詔遷都燕京，辛酉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金史》卷五本紀)

「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顯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園材木，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應天門十一楹，左右有樓門，內有左右翊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殿曰泰安，左右掖門內殿東廊曰敷德門，大安殿之東北為東宮。正北列三門，中曰粹英，為壽康宮，母后所居也；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曰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北曰仁政門，傍為朵殿，朵殿上為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內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宮城之前廊東西各二百餘間，分為三節，節為一門。將至宮城東西轉，各有廊百許間。馳道兩旁植柳。廊脊覆碧瓦，宮闕殿門則純用碧瓦。應天門舊名通天門，大定五年(1165)更。七年改福壽殿曰壽安宮，明昌五年(1194)，復以隆慶宮為東宮，慈訓殿為承華殿；承華殿者，為皇子所居之東宮也。」(《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都城之門，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其正門旁又皆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築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傳遞；空筐出，實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正隆四年(1159)二月丁未修。」(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金故城考》)

遼代的南京城，因襲唐代幽州薊城的舊址，並無多大改更。金代改燕京為中都，曾就遼城舊址加以擴充，使北京成為一座壯麗的大城。當時中都城的面積，約相等於現在北京內城的三分之二，規則十分完整。城中央是皇城(參閱圖一)，城外建有豪華的離宮別館。《金史·地理志》：「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1179)建，後更為寧壽，又更為壽安；明昌二年(1191)更為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台，又有瓊花島，又有瑤光樓……。」

當金朝的統治者在中都不斷營建宮室，享受榮華時，蒙古人已崛起漠北，接着不時入侵。元太祖十年(1215)，中都即為蒙古兵攻陷，宮殿城池遭到嚴重破壞，只有東北郊外的離宮(今北海公園)還大致完好。元滅金後，過了三十二年，忽必烈才決定遷都北京。他以東北郊外的離宮為核心，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稱為大都。

元大都開始興建於一二六七年，格局宏大，規劃整齊，為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也曾一度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元朝亡後，明朝利用元大都南半部加以改建擴建，逐漸發展為明清兩代的北京城，因此元大都實為明清北京城的前身。

位置因素常決定城市的初期發展，局部的地形則影響城市的規劃或佈局。古代北京的城市設計，曾將河湖水系的導引以及市區的規劃結合起來。在小比例尺地圖上，北京很靠近永定河；但事實上北京並不臨河，北京城距離永定河最接近處也有十二公里。永定河冬期河水枯竭、冰凍，沒有什麼防禦的作用；夏秋洪水暴發，每有泛濫災害。建立聚落的地點，必須遠離河岸。事實上，北京城坐落在永定河及西山諸小河所形成的洪積沖積扇的脊部，對於引水相當便利。

最早的北京城，從戰國時代的薊城一直到金朝的中都，都是在今蓮花池¹⁰以東（後來北京城的西南）同一原始聚落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城市範圍雖不斷擴大，但原來的城址始終沒有改變。而此一城址的選擇，實和蓮花池以及其東的一條小河有密切關係。

到元朝營建大都時，放棄了蓮花池水系上歷代相傳的舊址，另在其東北郊外選擇新址。此一轉移，主要因為：（一）元朝是一個統一了的大帝國，規模和以前的局部王國遼、金等不同，它要建立一個名符其實的全國性的更大的京城；（二）金中都城在爭奪戰中遭受嚴重破壞，不易修復，只有東北郊外湖泊區的離宮，還比較完整；（三）前述蓮花池水系的水源有限，不足以應付更大都城的用水需要，稍後還包括了開鑿運糧河的需要，必須轉移到一個較大的水系上去，也就是原來城址東北郊外的高梁河水系。其實當金代營建中都時，這一帶的湖泊已被開闢為風景區，後來並建立了一座稱為大寧宮的離宮。

高梁河原是永定河北岸的一條小支流，天然上游在今日的紫竹院公園。《水經注·灤水篇》：「灤水（永定河）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金代營建中都之後，為了開闢近郊水源，曾經開鑿一條引水渠道，穿過一帶平緩的分水嶺，把玉泉山和甕山泊（今昆明湖擴大以前的舊稱）的流水，引向現在的紫竹院公園，給高梁河增加了一段人工的上源。

¹⁰ 關於蓮花池的記載，最早似見於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當時名叫西湖，是薊城西郊的風景區。從西湖發源的一條小河古稱洗馬溝，現在叫做蓮花池河。酈道元描寫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游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明清以來學者常把這個西湖當作現在的昆明湖，是完全錯誤的。

(二) 元代大都的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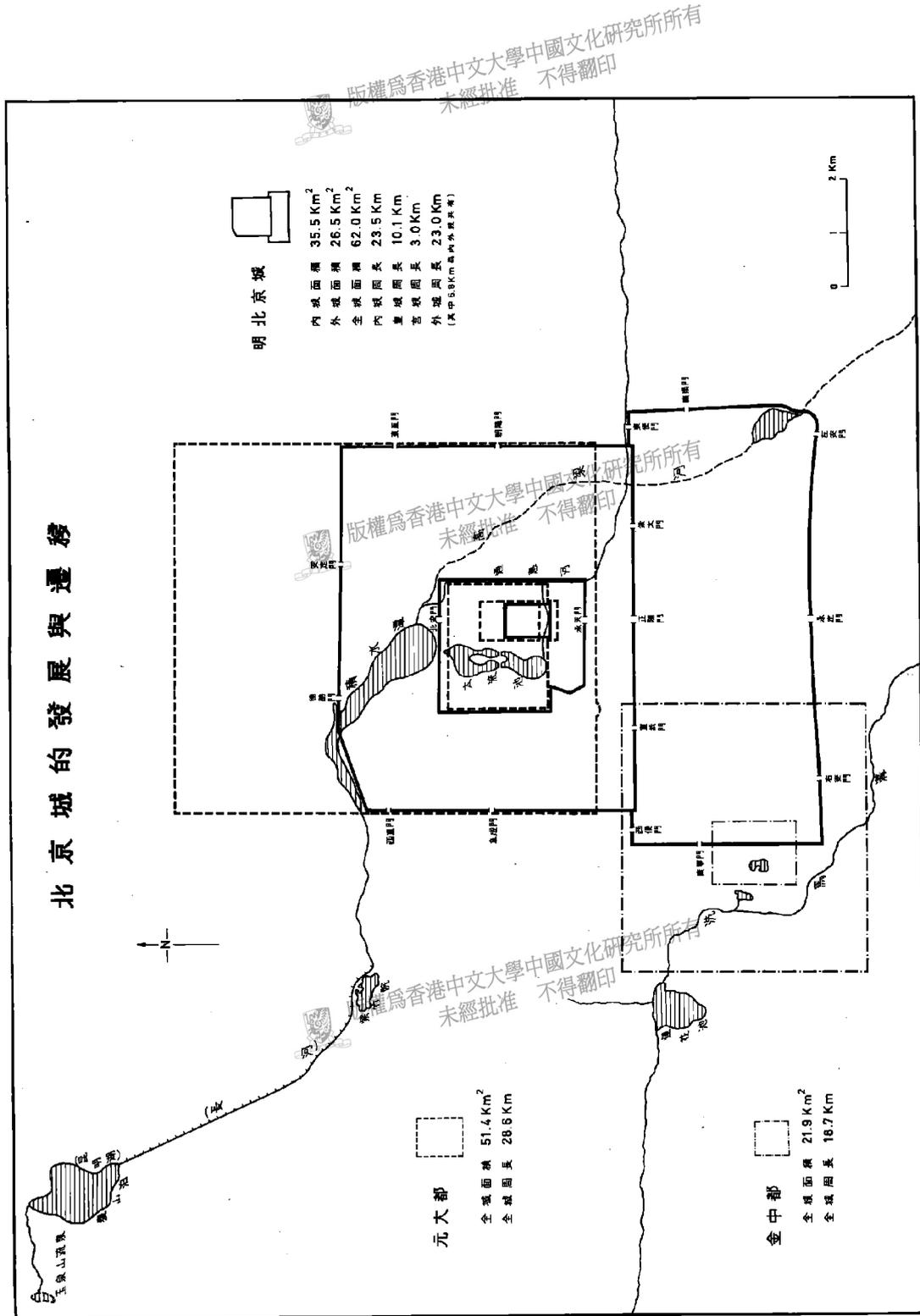
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早期會建立全世界空前的大帝國。在向東方的發展方面，蒙古人在太祖十年（1215）攻入中都，太宗六年（1234）滅掉金國。但到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才遷都北京；這時距中都陷落已有半個世紀。根據《元史》的零散記載，大致可知在至元元年改燕京為中都，至元四年（1267）動工築城，同時營建宮殿。至元八年（1271）建國號大元，次年改稱中都為大都。至元十一年（1274）宮殿建成，十六年（1279）滅掉南宋，二十九年（1292）大都城牆完工。築城的時間先後達二十五年。

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元故城考》：「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為燕京路總管大興府。世祖中統二年（1261）修燕京舊城。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始於中都之北建今城而遷都。九年改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有官者為先，仍定制以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築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築……。二十九年七月癸亥完大都城。」

《元史》卷五《世祖》二：「至元元年八月乙卯，詔改燕京為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春正月，立開元等路轉運司，城大都。夏四月甲子，新築宮城。九月壬辰，作玉殿於廣寒殿中。五年十一月，免南京河南兩路來歲修築都城役夫。七年二月丁丑，以歲饑，罷修築宮城役夫。八年二月丁酉，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宮城。九年五月辛巳敕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十一月壬戌，發北京民夫六千伐木乾山，斲其家徭賦。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

《元一統志》卷一《大都路》：「（至元）九年二月改號大都，遷居民以實之，建鐘鼓樓於城中。」洪武《北平圖經志書》：「（金）宣宗奔汴，元世祖改為燕京路，今舊南城是也。至元四年，始定鼎於中都之北三里（按應為東北），築城圍六十里。九年，改為大都。」

蒙古人的遷都北京，顯然是為了便利統治全中國；和金朝之將國都從哈爾濱附近遷到北京，意義是相同的。就中國而言，蒙古初都和林，固然太偏西北，後來雖遷到開



北京的都市發展

49

平，也還不方便，特別是糧食的供應。所以把開平稱為上都，另建大都作為實際的首都。忽必烈在位時，每年有一部分時間留在北京，夏天返回到開平避暑。《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京城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總管府，戶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用至元七年抄籍數）。」

「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區宇，其創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者，蓋以開平近在漠南，而幽燕與開平形援相屬，居表裏之間，為維繫之勢，由西北而臨東南，燕京其都會矣。」（《讀史方輿紀要·直隸序》）

元大都城的建設規模十分巨大，如城牆、城門、皇宮、水道、街坊、道路、府第、衙署、倉庫等等，皆遠超過了金中都城的規模。更重要的，大都是按照一個完整的規劃建造；在古代都市設計中，可算是一個最突出的典型。這個設計，第一次把中國古代營建國都的理想，配合實際的地理環境，在最近似的程度上，富有創造性的表現出來。

中國古代理想的都城，見於《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徑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大意是說：都城的營造，要作正方形，每邊長九里，各有三門。城中有縱橫垂直交錯的大道各九條。在城內的左方（東部）建築太廟，右方（西部）建築社稷壇。前面（南部）是朝廷，後面（北部）是商業中心。這個理想的都城設計，強調城市佈局的方正和規整，並把朝廷（宮城）佈置在全城的核心部位上。試看中國各著名古都，其規劃都沒有符合此一理想。漢代長安城雖有「面朝後市」的跡象，但其他皆不符合《考工記》的理想。

大都的城牆近於正方，宮城在城內南部中央。宮城正北，中心閣周圍是商業最集中的地區，¹¹太廟在宮城之東（齊化門內），社稷壇在宮城之西（地點不很確定），符合

¹¹ 從中心閣到麗正門這段距離，將近三公里。因為皇城先建了，如果要把此一距離縮短，則皇城和外城（大都城）之間的空地就很局促。如果再增長，全城的南北距離又嫌過大。況且再向南去不遠，就是金代所開自西向東的金口河故道。在要建造一座四方形城市的前提下，此一基本距離一經確定，大都城南北兩邊的位置也就確定了。東西兩邊城牆的位置，原受到自然的限制。因為要把積水潭包括在城內，故西邊的城牆只好建築在積水潭西端的南北直線上，而明代改建北城時西北一角的偏斜，也顯然受積水潭的影響。東郊原是一片低窪地，易於積水，為避免此一缺點，故東邊城牆向內偏了一點。換言之，以中心閣為中心，到東邊和西邊城牆之間的距離是不等的，東部一段的距離要比西部短些。這有可能是原來的整個計劃決定了以後，到施工時發現困難，才稍為變通一下。

《考工記》「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佈置原則。¹²此外城內的大街，連同順城街計算，也和《考工記》的九條之數相符（參閱圖二）。大都城內的佈局，以南北向的中軸線為基準。全城的中軸線，南起麗正門，穿過皇城的靈星門，宮城的崇天門、厚載門，經萬寧橋（又稱海子橋，即今地安門橋），直達大天壽萬寧寺的中心閣；這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¹³近年經過鑽探，在景山以北發現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遺迹，寬達二十八米，便是大都中軸線上大道的一部分。中心閣可以說是全城的幾何中心，環繞中心閣的周圍一帶（積水潭東岸）又是全城商業最繁榮的地區。但大都城的真正幾何中心，尚在中心閣以西二十三米，原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大字，作為城市設計所樹立的重要的測量標誌。元抄本《析津志》：「中心台在中心閣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畝，以牆繞繞，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實都中東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廟之前。」¹⁴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共同進行了元大都的考古工作，先後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廓、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遺址，發掘了十多處各種不同類型的建築基址；特別是一九六九年以後，配合建設工程，對和義門臺城城門及雍和宮後等處的若干居住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工作。經過廣泛的勘查和重點的發掘，探明了元大都外廓城址的形制和範圍。全城平面呈南北略長的方形，周圍共長二八·六公里。北面的城牆和東西兩面城牆的北段，至今地面上仍留有遺址，就是今天北京北郊的所謂「土城」；東西兩面城牆的南段，與明清北京城的東西牆一致；南面城牆的位置，在今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南邊城牆在靠近慶壽寺雙塔的地點，稍向外彎曲，以便繞過雙塔；因此南牆內的順城街，在雙塔附近也跟着向南彎曲；此一痕迹一直保留到解放後拓寬西長安街時。

¹² 《元史·祭祀志》：「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八月，詔建太廟於大都；十六年八月，以江南所獲玉爵及玷凡四十九事納于太廟。」《元一統志》：「太廟在都城齊化門之北。」《元史·祭祀志》：「世祖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有詔歲祀太社太稷；三十年（1293）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或言，于和義門內少南，得地四十畝，為壇垣，近南為二壇。」

¹³ 過去研究元大都城的著作，都認為全城的中軸線在後來明清北京城中軸線以西，也就是今日的舊鼓樓大街的南北垂直線。到明代初年改建北京城時，才把全城中軸線向東移到現在鐘鼓樓的南北垂直線上。現經勘查發掘，證明此項假定是錯誤的。元大都的鐘鼓樓，並不在中軸線上，而是偏於中軸線稍西，亦即舊鼓樓大街。明永樂十八年（1420）才改建鐘鼓樓於大天壽萬寧寺中心閣的舊址附近。因此，明清北京的鐘鼓樓才正建在全城的中軸線上。

¹⁴ 《日下舊聞考》卷五四也引有這一段文字，但漏去「西十五步」的「西」字，和「在原廟之前」一句，以致方位不清。十五步約折合二十三米。

《日下舊聞考》卷三八：「元時都城本廣六十里，明初徐達營建北平，乃減其東西迤北之半；故今德勝門外土城關一帶，高阜聯屬，皆元代北城故址也。至城南一面，史傳不言有所更改，然考《元一統志》、《析津志》，皆謂至元城京師，有司定基正直慶壽寺海雲、可菴二師塔，勅命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慶壽寺今為雙塔寺，二塔屹然尚存，在西長安街之北，距宣武門幾及二里。由是核之，則今都城南面，亦與元時舊基不甚相合。……」

大都城的城牆全部用夯土築成，基部寬達二十四米。爲了加固城牆，在夯土中使用了豎柱和橫木。城牆的收分很大，根據已發掘的城牆的收分推算，它的基寬、高和頂寬的比例約爲3：2：1。肅清門和健德門的甃城土牆，還部分地殘存於地面之上。從肅清門和光熙門基址的鑽探情況表明：城門的地基夯築得很堅固，城門建築是被火所焚毀的；大量的木炭屑和燒土的堆積層證明，城門建築可能仍爲唐宋以來的「過樑式」木構門洞。¹⁵城的四角都建有巨大的角樓。現在建國門南側的明清觀象台，就是元大都東南角樓的舊址。城的外部，等距離地建有加強防禦的墩台，其外再繞以又寬又深的護城河。土城的防雨排水設施，可能是採用城頂管道泄水的方式，以免雨水沖刷城壁。因爲最近在拆除北京西城牆時，在明清城頂三合土之下，發現了大都土城頂部中心安有排水的半圓形瓦管，順城牆方向斷斷續續長達三百餘米。但在元代初年，卻曾用葦草編排來保護城壁。

《日下舊聞考》卷三八引《析津志》：「世祖築城已周，乃於文明門外向東五里，立葦場，收葦以葺城，每歲收百萬；以葦排編，自下砌上，恐致摧塌，累期因之。至文宗有警，用諫者言，因廢此葦，止供內廚之需，每歲役市民修補。」

皇城位於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區，東牆在今南北河沿的西側，西牆在今西皇城根，北牆在今地安門南，南牆在今東、西華門大街以南。南牆正中的靈星門在今午門附近。大都的皇城俗稱「闕馬牆」，牆基寬約三米左右。蕭洵的《故宮遺錄》：「南麗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名紅門闕馬牆（相等於明代的皇城，城周十八里）。門內數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擊戴水中甚壯。遶橋盡高柳，鬱鬱萬株，遠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度橋可二百步，爲崇天門（爲宮城正門，相當於今午門），門分爲五，

¹⁵ 過樑式木構門洞的建築形式是門洞兩壁排立木柱，木柱上再搭架樑、枋、椽、板，門洞上部作扁梯形。敦煌石窟的唐式壁畫和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中，都繪有過樑式木構城門洞的圖象。

總建闕樓其上，翼爲迴廊，低連兩觀；觀傍出爲十字角樓，高下三級。兩傍去午門百餘步有掖門，皆崇高閣。內城廣可六七里，方佈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樓。其左有門爲東華，右爲西華。……」

宮城偏在皇城的東部，太液池之東。宮城的南門崇天門，約在今故宮太和殿的位置；北門厚載門，在今景山公園少年宮前，它的夯土基礎已經發現。東邊和西邊的城垣，在今故宮的東、西兩垣附近；換言之，元大都宮城的範圍，東西兩側的界限和明故宮差不多，只是偏南一些。宮城的牆基，由於明代的拆除改建，保存的不多；就殘存的部分說，最寬處超過十六米。

元人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一《宮闕制度》：「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軹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¹⁶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四隅，皆三趨樓，琉璃瓦，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鑄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西有鷹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五尺，重簷。……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

大都的宮殿宏麗，分佈於太液池東西兩岸；東岸是大內，較今紫禁城畧偏西北，包括大明殿（相當於太和殿）及延春閣（相當於乾清宮）。西岸有隆福宮及興聖宮，制度畧如大內，只是規模稍小。蕭洵《故宮遺錄》也說隆福、興聖二宮：「殿制比大明差小。」太液池東西兩岸之間，以儀天殿爲樞紐，就是今天的團城，亦即《故宮遺錄》所指的瀛洲圓殿。向北爲萬壽山，亦作萬歲山，¹⁷便是今日的瓊華島。絕大部分宮殿，皆

¹⁶ 按東華門東向，《輟耕錄》作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東西顯然爲南北之誤。

¹⁷ 《輟耕錄》：「至元八年（1271）賜名萬壽；泰定以後，史作萬歲，蓋相沿互稱耳。」《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1325）六月朔，葺萬歲山殿。四年十二月，植萬歲山花木八百七十本。」

用珍異工料建築，玉石雕刻精美。主持營建的是「將作院」，下設採石、大木、小木、泥瓦等局；在雕刻方面另設有玉局和石局。參與營建的人物，有張柔、段天祐、楊瓊、也黑迭兒（亦作亦黑迭兒丁，大食國人）、邱士亨、李郝寧、愨刺令兒、養安等，多為一代宗匠。宮殿內部的裝飾，工藝亦極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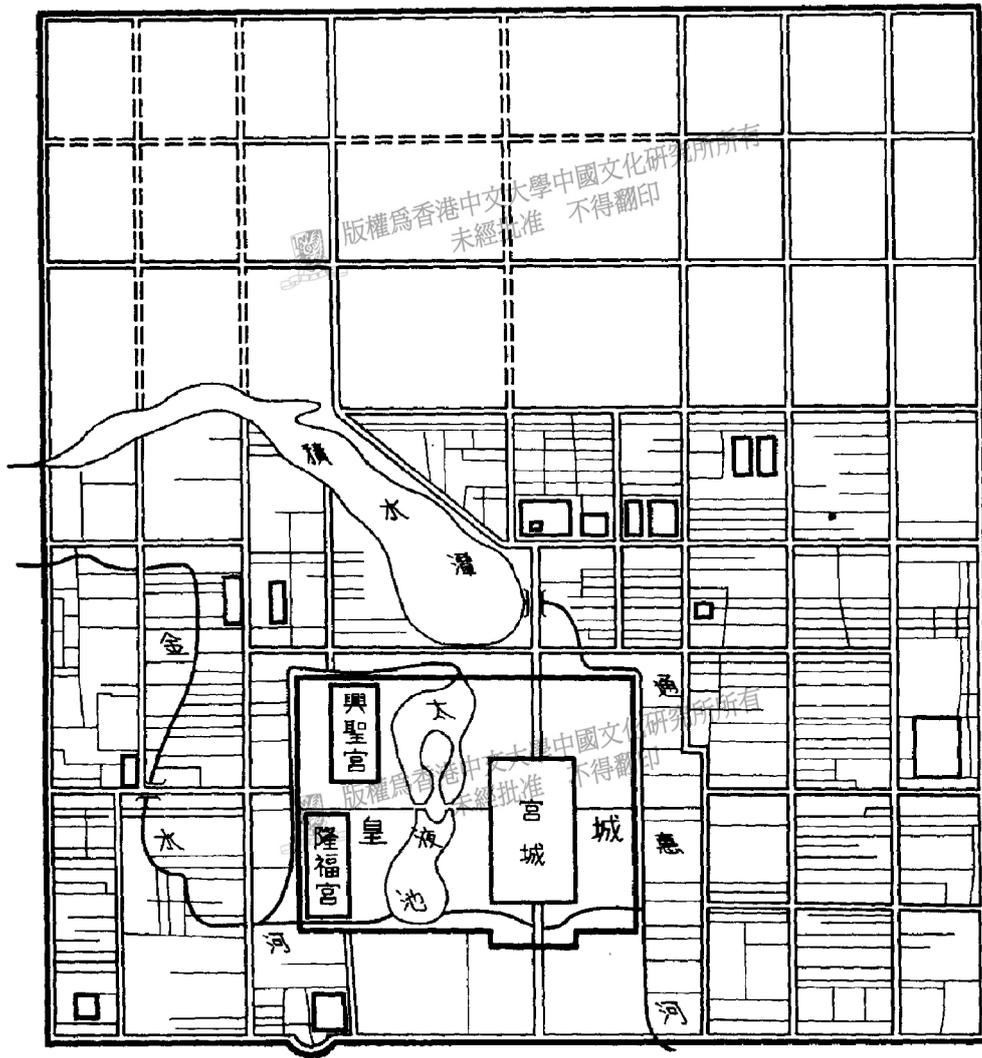
《輟耕錄》卷一描述萬歲山：「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1262）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轆，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於太液池。」以及明人《卓異記》所述的水晶宮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

當時旅居北京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對北京城曾有如此的描寫：「大汗常在名曰汗八里之大城中，每年居留三月。……此城在契丹之東北端，其大宮殿之所在也。宮與新城相接，在此城之南部。其式如下：先有一方牆，寬廣各八哩。其外繞以深壕，各方中闢一門，往來之人由此出入。牆內四面皆有空地，廣一哩，軍隊駐焉。空地之內，復有一方牆，寬廣各六哩，南北各關三門，中門最大，常關閉，僅大汗出入時一為開關而已。餘二門較小，在大門之兩側，常開以供公共出入之用。此內牆四角及中央，各建一壯麗城樓。由是全牆周圍共有八樓，貯大汗戰具於其中。……此第二方牆之內，有一第三城牆，甚厚，高有十步，女牆皆白色。牆方，周圍有四哩，每方各有一哩。¹⁸此第三城牆關六門，佈置與第二城牆同。……第二第三兩牆之間，有樹木草地甚麗，內有種種獸類。……此周圍四哩牆垣之內，即為大汗宮殿所在。其宮之大，素所未見。……內殿及諸室牆壁刻畫塗金，代表龍、鳥、戰士、種種獸類、有名戰事之形像。天花板之刻畫亦祇見有金飾繪畫，別無他物。宮之四方各有一大理石級，從平地達於環繞宮殿之大理石階上。朝賀之殿極其寬廣，足容多人聚食。宮中房室甚多，可謂奇觀；佈置之善，人工之巧，無逾此者。屋頂為紅綠藍紫等色，結構之堅，可以延存多年。窗上玻璃明亮有如水晶。……大汗宮殿附近，北方一箭之地，城牆之中（按即皇城之中），有一丘陵，人力所築，高百步……名曰綠山。……更北城中，有一大坑，深而廣，即以其土建築上述之丘陵，掘後成湖。有一小渠貫注流水於其中，佈置與一魚池無異，諸獸皆來此飲水。此渠由上言丘陵附近旁之一水道流出，注入別一湖中，其湖亦寬廣，處大

¹⁸ 馬可波羅所指周圍四哩之牆，亦即宮城之牆，周圍實僅 3,498 米，磚整，高 11 米；東西寬 766.5 米，南北長 982.5 米。1271 年陰曆八月十七日動工，經七個月完成。

汗宮及其子成吉思之宮間，其土曾供築丘之用。後一湖中畜魚，種類甚多，以供御食，大汗取之惟意所欲。渠水由別端外流，其兩端間以銅鐵格子，畜魚不能外出。其間亦見有天鵝及其他水禽。兩宮之間有橋，通行水上。……」（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八十三章）

大都的街道整齊，城內民居劃分為五十坊，《元一統志》載有這五十坊的坊名。近年勘查工作證明，大都城內街道分佈的基本形式是棋盤形，東西和南北各有九條大街；



圖二 元大都的道路系統和主要水道

（採自《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一文，畧加修改。原圖見《考古》1972年第一期，第20頁。）

在南北向大街的東西兩側，等距離地平排着許多東西向的胡同。大街寬約二十五米，胡同寬六至七米。現在北京城內的許多街道與胡同，仍然可以反映元代大都街道佈局的舊迹。在南北主幹大街的兩旁，築有排水渠。例如在現今「西四」地下發現的排水渠，便是用石條砌築的明渠，寬約一米，深一·六五米；在通過平則門內大街（今阜內大街）時，頂部覆蓋了石條。渠內石壁上，還留有當時工匠刻鑿的字迹：「致和元年（1328）五月日，石匠劉三。」

馬可波羅曾盛讚大都城內規劃完美，劃線整齊：「各大街兩旁，皆有種種商店屋舍。全城中劃地為方形，劃線整齊，建築房舍。每方足以建築大屋，連同庭院園圃而有餘。以方地賜各部落首領，每首領各有其賜地。方地周圍皆是美麗道路，行人由斯往來。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八十四章）

忽必烈營建大都宮殿，係從金代離宮大寧宮着手。這個大寧宮的主要部分，包括現在北海公園的瓊華島（白塔山）以及團城附近的一帶地方。當時環繞瓊華島的湖泊，即後來所稱的太液池，只包括今日的北海和中海；南海尚未開闢。新建大都的宮城，位於太液池東岸；另在西岸建築隆福宮和興聖宮。今日團城所在之處，當時稱為瀛洲或圓坻，也就是東西兩岸通過一條長木橋相互聯繫的中心。忽必烈營建大都之前，在中統三年（1262）先修繕了大寧宮，所以這一帶可能是當初營建大都發號司令的中樞。《元史·世祖紀》：「至元四年九月，作玉殿於廣寒殿中。」¹⁹《輟耕錄》指出廣寒殿在白塔所在處。

「興聖宮丹墀皆萬年枝，殿制比大明差小。殿東西分道為闕門，出繞白石龍鳳闕楹，闕楹上每柱皆飾翡翠，而實黃金，雕鳥獅座。中建小直殿，引金水繞其下，甃以白石，東西翼為仙橋，四起雕窗，中抱綵樓，皆為鳳翅飛簷，鹿頂層出，極為奇巧。樓下東西起日月宮，金碧點綴，欲象扶桑滄海之勢。壁間來往多便門出入，有莫能窮。樓後有禮天台，高跨宮上，碧瓦飛甍，皆非常制，盼望上下，無不流輝，不覺奪目，亦不知蓬瀛仙島，又果何似也！」（《故宮遺錄》）

「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亦作萬歲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

¹⁹ 《輟耕錄》卷二一：「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臺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峯，玉簪鐵一縣。」《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年（1265）十二月，瀛山大玉海成，勅置廣寒殿。」

尺，重簷，圓蓋頂，圓台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台西向，列甃磚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濶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吊橋，長四百七十尺，濶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輟耕錄》卷二一）

大都城內的水源比較缺乏，要從西北郊導引許多小流泉來解決城內的給水問題。當時供應大都用水的水道有兩條：一條是由高粱河、積水潭、通惠河構成的漕運系統；一條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構成的宮苑用水系統。近年對這兩條水系都作了勘查和部分的發掘。

元代的高粱河從和義門北入城，滙爲積水潭（俗稱海子），當時積水潭的面積，畧大於今日太平湖、什剎前後海的範圍。爲了使南方的漕運船隻經通州直達大都城內，開挖了通惠河，置閘節水。通惠河繞皇城東邊而行；在皇城東北角處的寬度約達二七·五米。流出大城南牆後，和金朝所開金口河的下游故道相會，轉東流注潮白河，這就是後來所謂南北大運河的上游。至元三十年（1293）河工完成，糧船可經通惠河運入大都，停泊在積水潭內。此一水利工程係由郭守敬設計，不但改善了自通州陸運的困難，而且也促進了積水潭東北岸鐘鼓樓、斜街一帶商業區的形成。

金水河導源於玉泉山，從和義門南約一二〇米處入城，入城的水門是最近拆除西城牆時發現的。金水河入城後，先向東流，然後折向南流，再轉東南，到現在靈境胡同西口分爲二支：北支沿皇城西邊，直向北流，再沿皇城北邊折向東流，注入太液池。南支一直向東流，也注入太液池，再從太液池東南角流出，滙入通惠河（參閱圖二）。這條金水河專門供給宮苑用水，民間不得汲引。終元一代，「金水河濯手有禁」懸爲明令。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窰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輝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牐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

之。……成宗元貞元年（1295）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牛，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牛，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為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1327）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三年（1330）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河，安置閘座，全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枝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到了元朝末年，因天下大亂，統治者想借城池的堅固來維持局面，下令在大都的十一個城門趕築甕城並架設城門外護城河上的吊橋，以加強大都的防禦設施。這些甕城和吊橋，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全部完工了。《元史》卷四五《順帝本紀》：「至正十九年（1359）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吊橋。」但據最近發掘所得和義門甕城門洞內青灰皮上刻劃的「至正十八年四月廿七日記」題記，則和義門甕城於此時已經建成，足以證明《元史》所記有誤。可能至正十九年十月是大都十一門甕城和吊橋全部完工的年月。再隔八年，元朝就滅亡了。

（三）明代北京城的重建與改建

元代立國不足百年，終被朱元璋推翻，建立了明朝（1368—1644）。明朝最初定都南京，北京在戰爭中的破壞不大，明太祖命令把大都的宮殿拆除，將材料搬到南京營造皇宮。這原因不單是經濟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他既不建都北京，就無須保存堂皇華麗的宮殿。故除留下一小部分次要的宮殿備為將來應用外，²⁰其餘完全拆遷。於是原先大都金殿耀日、玉宇連雲的宮闕，就給毀掉。

《明太祖實錄》卷三二：「改湖廣行省參政趙耀為北平行省參政。耀嘗從徐達取元都，習知其風土民情，邊事緩急；上命改援北平，且俾守護王府宮室。耀因奏進工部尚書張允所取北平宮室圖，上覽之，令依元舊皇城基改造王府。三年七月，詔建諸王府；

²⁰ 當時拆除的主為宮城部分，其西的隆福宮和興聖宮被保留下來。朱棣封燕王後，隆福宮便改為燕王府；也就成為日後重建北京城的指揮中心。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1380）到達北平。大都宮殿至今還殘存的，只有儀天殿（今承光殿）、妙應寺的白塔以及廣寒殿的玉臺而已。

工部尚書張允言，燕國用元舊內殿（隆福宮），上可其奏。」

明代初年的北京，因為不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商業隨之蕭條，人口跟着減少。²¹所以洪武三年（1370）徐達重建北京城牆時，因嫌北城一帶空曠，居民稀少，為便利防守，就把北邊的城牆向南縮了五里，改建為日後安定門和德勝門一線的城牆；其北原址在解放前尚有土牆，高二三十尺，居民即稱其地為土牆。徐達將北京城的北邊向南收縮，主要是因為運河終點的南移。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採用水閘方法，引山泉開成通惠河後，糧船可從通州以南的高麗莊，循通惠河逕入大都城內，停泊在皇城以北的積水潭，使附近成為商業中心。《元史·郭守敬傳》：「（至元）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但其後積水潭淤縮，通惠河失修，漕運只能到達城南，商業中心隨之遷移城南，於是北城市況衰落，人烟稀少。

《順天府志·京師志》：「洪武初，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里，廢東西之北光熙、肅清二門，其九門俱仍舊。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又令指揮張煥計度故元皇城周圍一千二百六丈，又令指揮葉國珍計度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時舊基也。改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健德門為德勝門。舊土城周圍六十里，克復後以城圍太廣，乃減其東西迤北之半，創包磚甃，周圍四十里。其東、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餘，上濶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濶五丈。濠池各深濶不等，深至一丈有奇，濶至十八丈有奇。」

明成祖朱棣奪得皇位後，一方面鑑於北方邊防重要，必須嚴防蒙古人的再起，同時也感覺到北平為「龍興之地」，故決心遷都北京。先建北京為行在所，進行營造宮殿。因南城缺少修建衙署的土地，到永樂十七年（1419）又將南邊的城牆拆了，向南推出一里，拓展到日後內城南邊的線上。南城所拓寬的地方，主要用以修建衙署，開闢了一個新的行政區。永樂十八年九月，宮殿告成，十九年元旦御新殿受朝賀，正式改北京為京師，而將原來的京師改稱南京。

《讀史方輿紀要·直隸序》：「蒙古之餘裔猶熾，習見燕都之宮闕朝市，不無窺伺

²¹ 據《太祖實錄》卷三〇、三一，可知明初攻克北京後，曾把一部分元朝官吏及其家屬遷到南京。在決定以汴梁為「北京」之後，又把一部分居民遷到了開封。加上死亡、隱匿和流徙，據洪武二年北平府統計，全府才有14,974戶，48,973人；除掉大量駐軍之外，北平城內居民很少。永樂元年順天府全府居民為189,300戶。

之情。太宗（成祖）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於燕，因而整戈秣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

《明史》卷四〇《地理志》：「永樂元年（1403）正月，建北京於順天府，稱行在。二月罷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行部。」在永樂二年九月遷徙山西省居民一萬戶到北京，《明實錄·太宗永樂實錄》卷三一：「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順天府志·京師志》：「永樂元年……以北平為北京，府為順天府。四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

在北京興建期中，成祖朱棣多在南京，但曾數次北巡。第一次在永樂七年三月抵北京，八年九月回南京；中間在八年二月到七月親征蒙古。第二次北巡在永樂十一年四月到達北京，十二年三月第二次親征瓦剌等「胡虜」，到十四年十月又回到南京。第三次北巡在十五年五月，以後他就不再回南京了。最初因為皇帝要經常在南京、北京之間往來，所以在永樂四年閏七月，文武羣臣就以「備巡幸」為理由請建北京宮殿。這是臣下附和成祖內心計劃的建議，當然馬上被接受。於是就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大興土木來建築北京的宮殿。

《明實錄·太宗永樂實錄》卷四四：「壬戌，文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遠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右都僉史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人月給米五斗、鈔三錠。命泰寧侯陳珪，北京行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人月給米五斗。命工部徵天下諸色匠作，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各衛選軍士；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隸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徐州、和州選民丁，期明年（1407）五月俱赴北京聽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給米五斗。其徵發軍民之處，一應差役及開辦限課等項，悉令停止。」

明朝的建設北京，遺留下了三項偉大的工程：北京城、皇宮和明陵。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最初因為北邊收縮了五里，所以遠比元大都城為小。（參閱圖一）永樂十七年到十九年間，雖將南邊的城牆向南擴展了一里，還是遠小於大都城。直到中葉以後，城南人口大增，正陽門外已很繁榮；同時又須提防瓦剌、俺答等鄧落的南侵，故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築了外城，三面全長二十八里，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完成。（原本準備在京城四面再築一圈防禦性的外城，後來因財政困難改變計劃，只築了南城一方。）於是造成了日後北京城凸字形的形式，並且有了內城和外

城之分。內外城合計，面積達六十二方公里，超過了元代的大都城。²²

《順天府志·京師志》：「嘉靖二十一年，掌都察院毛伯溫等言宜築外城。二十九年命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外城，既而停止。三十二年，給事中朱伯辰言：城外居民繁夥，不宜無以圍之。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補薄，培缺續斷，可事半而功倍。乃命相度興工。……上又慮工費重大，成功不易，以問嵩等。嵩等乃自詣工所視之，還言宜先築南面，俟財力裕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面之制……前此度地畫圖，原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橫濶凡二十里，今既止築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堅築，可以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報允。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轉抱東西角樓，止長二十八里，為七門，南曰永定、左安、右安，東曰廣渠、東便，西曰廣寧、西便。城南一面長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東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梁口四尺，基厚二丈，頂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門甕城。四十三年六月丁酉京師重城成。」

北京城的內城計有三重，最內的一重為宮城，亦即紫禁城，周圍三公里，開有八個城門。第二重為皇城，周圍約九公里，開有六個城門。皇城地段為當時內府官員的住宅區和各衙署所在的行政區。第三重為京城，周圍約二十三公里，城牆高約十二米；開有九個城門，城外有濠。北京內外城和宮城的城牆，皆用最好的城磚建造。在內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門上，屹立着十多個環衛的突出點——城樓和角樓。內城的九個城門，外城的七個城門，每個門上都建有城樓。城門之外又築有箭樓。箭樓的兩側又有弧形的或方形的牆和城牆相接，形成甕城。箭樓和甕城，都是防禦性的建築。北京內城的城樓和城濠，實際上要到正統年間（1436—1449）才次第完成。

《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京師》：「宮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門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門，第三重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元武。宮城之外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門六；正南曰大明，東曰東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門東轉曰長安左，西轉曰長安右。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門九。……領州五、縣二十二。弘治四年（1491）編戶一十萬五百一十八，口六十六萬九千三十

²² 根據我們所繪的地圖，再用求積儀測量，得北京內城的面積為35.5方公里，外城面積26.5方公里，合計為62方公里，而元大都城的面積為51.4方公里。

三。萬曆六年（1585）戶一十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口七十萬六千八百六十一。」

《順天府志·京師志》：「城垣南面廣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長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下石上甃，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頂濶五丈。設門九，門樓如之，角樓四，城梁一百七十二，旗砲房九所，堆撥房一百三十五所，儲火藥房九十六所，雉堞一萬一千三十八，砲窗二千一百有八。凡門樓均朱楹丹壁，檐三層，封檐列脊均綠琉璃。……正陽門東西、崇文門東、宣武門西、朝陽門東、東直門南、德勝門西，各設水關一，均內外三層，每層皆護以鐵柵。外城環京城南面，轉抱東西角樓，長二十八里，為門七，南為永定門，左為左安門，右為右安門，東為廣渠門，西為廣寧門。在東西隅而北向者，東為東便門，西為西便門。明嘉靖三十二年建，四十三年成。本朝重加修整，外城南面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東長一千八百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下石上甃，共高三丈，堞高四尺，址厚二丈，頂濶一丈四尺。設七門，門各有樓。……東便門東，西便門東，水關各一，皆三洞，每洞內外均有鐵柵。東便門西，水關一，內外二層，鐵柵如之。」

舊北京城區的結構大致形成於明代，北半是內城，南半是外城，由一條長達八公里的中軸線縱貫南北，作為全城佈局的依據。外城南邊正中的永定門，是這條中軸線的起點。從永定門北行，左右有天壇和山川壇兩個約畧對稱的大建築羣。²³再往北就是進入內城的第一個重點正陽門（前門），接近了皇朝的統治中心。由正陽門進大明門（清代改稱大清門，民國改稱中華門，現已拆除），可見一條寬濶的「御道」，兩旁有聯檐通脊的千步廊，直達承天門（天安門）前，組成一個巨大的「T」字形廣場；其東有長安左門，其西有長安右門。

作為皇城正門的承天門，建築穩重輝煌，形象威嚴壯麗；點綴着金水橋、華表和石獅等。由承天門起，開始進入中軸線的中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先是太廟和社稷壇的東西並列，再前進就到達宮城的正門午門。午門以內有前三殿和後三殿，為皇宮所在，是舉世無匹的大建築羣。宮城背後的景山，處於內城中央，是全市的最高點，正好堆築於元代宮城延春閣的舊址上，而延春閣是元朝皇帝起居之所，故帶有迷信的鎮壓意義。有明一代，把景山視為鎮山；但明代的最後一個皇帝，卻在景山自縊而死。登臨景山，可俯瞰舊北京全城。中軸線的終點在鐘鼓樓，在皇城後門之北，建築在元代中心閣的位

²³ 山川壇在西邊，最初稱地壇，後來改稱先農壇。

置上，南北相對，作為全城的報時中心。

永樂對北京城的改建，最主要的是在全城的中軸線上，把宮城的位置畧向南移。由於宮城的南移，皇城和京城的南牆，也不得不隨之南移，從而決定了承天門和正陽門的位置。利用皇城和宮城之間新開拓的空地，仿照明初南京城的規劃，在中軸線左右兩側建築太廟和社稷壇，仍然保持着「左祖右社」的傳統意義。此一佈局增加了中軸線的重量，以及從承天門到正陽門之間的深度。同時又在社稷壇以西開鑿了南海，擴大皇城中心的水面。再利用承天門以南到大明門之間的擴建部分，遵循唐、宋以來的舊規，把中央政府的主要官署，沿着宮廷前的中軸線，左文右武，對稱地排列在東西兩側，²⁴徹底改變了元大都城內中央衙署分散的情況。至於大明門和正陽門之間的地段，有計劃地保留了東西城交通往來的孔道，稱為棋盤街。此一格局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只是若干官署的名稱畧有改變。

皇宮也是在元大都宮城的基礎上建築起來，先後的中軸線相一致。我們從蕭洵的《故宮遺錄》及陶宗儀的《輟耕錄》等著述中，可看到明代宮殿的建制，深深受到元大都宮殿佈局的影響。²⁵事實上明太祖拆毀元大都宮殿，把材料搬到南京去造宮殿；以元故宮建制的完備，南京所建新宮，必然受到影響。朱棣少年時居住南京宮殿，熟悉這些宮殿的形制。封燕王就藩後，住的是元代的隆福宮。後來他自己在北京重建宮殿，自然會想起拆遷時的一些經手人，要他們仿照舊制而參加營造。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²⁴ 長安左門外為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工部、兵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等。長安右門外為中軍都督府、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以及錦衣衛等。

²⁵ 例如承天門的華表，就沿襲元崇天門前橋邊的華表。《故宮遺錄》：「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擎戴水中甚壯。」明奉天殿和元大明殿的三重白石闌及三級階，建制完全相同。《故宮遺錄》：「正中為大明殿，殿基高可十尺，前為殿陛，納為三級，繞以龍鳳白石闌；闌下每楹壓以鼉頭，虛出闌外，四繞于殿。」《輟耕錄》卷二一也說：「大明殿，乃登極正且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試以和《清宮史續編》所說：「正中南嚮，為太和殿，皇朝之正殿也，基崇二丈，殿高十有一丈（除了基部便是高九十尺），廣十有一楹，縱五楹，上為重檐垂脊」比較，便可看出沿襲之跡。城門和角樓的制度，也多模仿元大都。《輟耕錄》卷二一：「宮城……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現在的東華和西華，各七間三門，和元制完全相同；惟神武門（相當於元厚載門）也是七間三門，規模稍大。現在宮城的四隅，皆有角樓，重簷三層，覆以琉璃，也顯然仿自元制。《輟耕錄》卷二一：「角樓四，據宮城之四隅，皆三層樓，琉璃瓦飾簷脊。」

六：「初燕邸因元故宮，即今之西苑，……太宗登極後，即故宮建奉天三殿，以備巡幸受朝。至十五年（1417），改建皇城（按實指宮城）於東，去舊宮可一里許，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過之。……新宮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居民，喧囂之聲至徹禁御，宣德七年（1432）始加恢擴，移東華門於玉河之東，遷民居於灰廠西之隙地。」這說明永樂時的東華門乃照元代舊址，到宣德七年才向河東展移。明宣德以後宮城東邊城牆位置和元代宮城的不同，在乎元代宮城東牆在通惠河以西，而明代則在通惠河之東。

北京城的經營締造，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一種集中表現。它的平面設計和宮殿建築的配置及造型上，體現了皇朝統治者的政治要求和意識形態。會動用極大的人力物力，陸續完成規模宏偉的建築工程。這也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非凡的智慧和才能，以及他們在當時科學技術上所達到的水平。

舊北京城內的土地利用，大致根據當時的社會條件及生活要求進行區分。內城除了宮城內的皇宮外，皇城區是當時內府官員的住宅，東交民巷和西交民巷一帶是各衙署所在的行政區（其中東交民巷在「辛丑條約」後曾被劃為使館區）；北城一帶散佈着一些王府，東四牌樓和西四牌樓是東西城的兩個主要市場。這從附近街巷的名稱也可以看出：例如東四牌樓附近的豬市大街、小羊市、多福巷（豆腐巷）、和禮士胡同（驢市胡同）；西四牌樓鄰近的馬市大街、缸瓦市、羊市大街、羊肉胡同、粉子胡同等街道，都是各種專業市場的名稱。鐘鼓樓一帶，也曾經是熱鬧的街市。舊北京有句俗話，說城區最熱鬧的地方是「東四西單鼓樓前」。南城方面，大致正陽門以東是手工業區和商業區，這裏有打磨廠、木廠胡同、梯子胡同、果子市、鮮魚口、瓜子店等等。以西是商業區，有珠寶市、糧食店、錢市胡同、煤市街等等。這些街道的名稱說明了當時土地利用的性質。舊北京所有的一百多所外省、外縣會館，也多數集中在南城方面。

城內的街道，基本上採取方格型的規劃系統，這正是中國城市街道的傳統規劃方式。大街和小巷分工，大街是主要的交通幹線；和大街相垂直的小巷（胡同），則是住宅區的道路。在較長的街道上，常建造一些點綴街景的附屬建築，像牌樓、門洞之類，用以分割街道的空間，調節漫長道路的單調感覺；另一方面，也起了街道的對景作用。像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以及天安門廣場兩側原有的三座門，都會起點綴街景的作用。²⁶ 每一個城門之內，都有一條寬濶的大街；但相對的兩個城門內的大街，並非

²⁶ 這些原先大街的點綴建築物，已不合現代城市發展的需要。例如牌樓，現已分別遷到各公園裏，在適當地點重新建立起來，留作紀念。

完全平直貫通；實際上是一個交錯的方格體系。（參閱圖六）皇城的存在，在很大部分隔斷了全城的交通，給市民帶來很大的不便。現在皇城已經拆除，宮城也已開放，並在故宮前後修築了東西城交通的幹線大道，形勢已完全改變。

在結合城市規劃與河湖水系的利用方面，明代的北京沒有新的發展，反而比元朝退步了。金水河被廢棄，積水潭下游的通惠河，因皇城北面和東面的開拓而被圈入城內，從此完全失掉了運河的作用。另外積水潭本身，因為淤塞以及豪門大戶的與湖爭地，面積日益縮小。²⁷原在內城南邊外側的金口河故道，也因為外城的拓建終被全部湮塞。有明一代，只是部分地開鑿了內外兩城的護城河，借以引水和排洪。此後直到清朝末年，北京城的平面佈局沒有發生重大變動。

（四）清代的園林營造

明清兩代交替之際，北京沒有受到多大破壞。由於文化水平上的顯著差異，滿清樂於全盤接收北京作為他們新的國都。清代對於北京城的總體佈局，並無改變；主要的修建工作，也只是在明代的基礎上進行。例如故宮的建築羣，便經過清代的重建和改建，但在中軸線上的佈局，還完全是明代舊有的規模。《大清一統志》卷一《京師》，曾提到宮邑維舊：「本朝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撫有九域，聲教廣被，靡遠弗屆。幅員所暨，東包朝鮮，南越瀛海，北抵大漠，西踰流沙。而定都京師，宮邑維舊。」

清代對北京的貢獻，主要限於園林的開拓和營造，也可說是京城的修飾工作；在這方面確有突出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前代。像城內的三海（北海和中、南海），城外的圓明園、暢春園、頤和園、靜宜園和靜明園等，²⁸都是規模巨大的造園傑作。

園林的營造不能缺乏山水，沒有山要造假山，沒有水可自他處導引。西郊從海淀以

²⁷《大清一統志》卷二《順天府》：「積水潭在宛平縣西北三里，東西瓦二里餘，南北半之。西山諸泉，從高粱橋流入北水關，匯此。折而東南，直環地安門官牆，流入禁城為太液池。」《燕都遊覽志》：「積水潭內多植蓮，亦名蓮花池。或因水陽有淨業寺，名淨業湖，俗又呼為海子套。按元時既開通會河，運糧直至積水潭。自明初改築京城，與運河截而為二；積土日高，舟楫不至。是潭之寬廣，已非舊觀。故今指近德勝橋者為積水潭，稍東南者為十刹海，又東南者為蓮花泡子。其始實皆從積水潭引導成池也。」

²⁸在嘉慶二十五年重修的《大清一統志》卷一京師圖上，西北郊繪有圓明園、暢春園、綺春園、長春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等七個名園。

至西山一帶，有山有水，是天然風景區，成爲園林營造的重點。遠在十一世紀初期，遼代便在西山修築離宮；十二世紀末金章宗營造香山，進一步開發了香山的風景區。此後西山一帶便逐漸成爲歷代帝王、顯貴的遊玩勝地。明代正德年間（十六世紀初），在蹇山原來的園靜寺一帶經營園林，稱爲好山園。清代帝王更加奢侈，追求享樂，園林經營超越了元明各代。康熙時期的暢春園，乾隆時期的圓明三園（圓明、萬春、長春三園，總稱圓明園）、三山（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萬壽山清漪園），以及晚清大力經營的頤和園（原清漪園），都是大型的園林。北京所有的園林，不論皇家園囿或私人花園，皆頗受江南園林的影響，但也有其獨特的處理手法和風格。一般而論，北京園林較江南爲端重，但缺少開暢通達的活潑情趣。

頤和園是北京西北郊的名園，也是全國現存最宏麗的園林，佔地三·四方公里。它是萬壽山、昆明湖的總稱，距西直門十多公里，西接玉泉、西山諸峯；北部萬壽山約佔全園面積的四分之一，南面山下的昆明湖約佔四分之三。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明代好山園的原址上擴建蹇山行宮，乾隆十五年（1750）弘曆爲了慶祝他母親的六十壽辰，在此改建大報恩延壽寺，改稱蹇山爲萬壽山，改湖名爲昆明湖，開始大規模營造園林，命名清漪園。并疏浚昆明湖，在湖東築堤，作爲調節京城水源的蓄水庫。當時在現今佛香閣的位置上建有九層寶塔，後湖沿岸一帶建有仿照蘇州街市的房屋，後山則有喇嘛大寺和西藏式碉樓。咸豐十年（1860）被英法侵畧軍焚毀劫掠，光緒十四年（1888）慈禧挪用海軍軍費將其修復，並改稱頤和園。光緒二十六年（1900）又被八國聯軍破壞，光緒二十九年再度修復。

頤和園共有殿、堂、樓、閣、亭、廊、軒、榭等各式大小建築三千餘間，橋樑三十座，以及數十處奇巧山石和漫長的沿湖石欄；集中國建築藝術的精華，被視爲民族園林藝術的典範。全園大體可分爲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東宮門內，有仁壽殿、德和園、樂壽堂、頤樂殿和大戲台等建築，爲帝后聽政、住宿和看戲之處。由此朝北可登萬壽山，往西南通長達七二八米的沿湖長廊；長廊的樑上，繪着數百幅西湖風景畫，可見當時皇室人員對江南風景的讚賞。第二部分是前山，亦即萬壽山最高處及其南坡，正中是一座八角四層的佛香閣，周圍環護着許多建築，包括最高處的智慧海以及轉輪藏和五方閣等等。由佛香閣而下，又有德輝殿、排雲殿、芳輝殿、紫霄殿、玉華殿、雲錦殿等，組成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直到昆明湖邊的牌坊——玉宇雲輝。第三部分是後山，包括「香岩宗印之閣」和「須彌靈境」等，更爲偏僻幽靜；東邊的詣趣園，模仿無錫的古園林，山光水色，如同圖畫，稱爲園中之園。第四部分是昆明湖，因在南邊，故又稱南湖。

乾隆十六年加築東堤，開拓湖面，周圍增為十五公里，面積比明代擴大兩倍。湖中有三數小島及長堤，也有六座橋，係模仿杭州西湖的六橋烟柳造成；湖東通龍王廟的十七孔橋，更是湖上突出的景物。

頤和園原不僅是一個純供遊玩的園林，同時也具有宮廷的作用。全園的總體佈局繼承了中國造園藝術的傳統手法——「因、借、正、變」，而經過周密設計。它效法自然，利用自然，並創造出和自然接近的景物來。它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條件下利用地形建造適當的建築。它應用了「借景」的手法，把西山諸峯的景色組織到頤和園來。淡藍色的西山襯着玉泉山的白塔，作成了萬壽山的美麗的背景。園內則通過曲徑、遊廊、高台、亭閣，將各組景物聯繫起來；互相資借，彼此襯托，極盡變化之能事。

圓明園位於北京西北郊的海淀區，在頤和園以東，清華園西北。園內的湖與池雖然利用了天然的沼澤，但小山都是挖湖堆積而成。該園開闢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當初是一座御賜的親王花園，規模甚小；雍親王繼承皇位後，在雍正三年着手全面修建。²⁹除了整頓原有的山水亭樹之外，又增添了許多建築。乾隆年間進行了大規模營建，摹仿江南名園勝景規劃全園，創造了所謂「四十景」，包括九州清晏、鑲月開雲、天然圖畫、碧桐書院等等；每一景中又有許多小景，一個小景就擁有亭、台、樓、閣等建築羣。這時向北拓展了圓明園，東面增修了長春園，南面又合併了王公花園修成綺春園（萬春園），形成著名的三園。³⁰

三園之中以圓明園為最大，共有十八座大門。三園的佈局以水景為主，水面縈繞與陸地交錯，多作小面積分割，僅圓明園東部的福海面積為較大。三園的建築又各有不同的風格。圓明園前部為朝廷區，自大宮門經「出入賢良門」直到「正大光明殿」，建築物分佈有嚴肅的軸線；惟北部和東部福海的處理較為自然。長春園水面規劃較圓明園稍為寬濶，北部有仿意大利文藝復興式樣建造的「西洋樓閣」羣組和噴泉等西式園林建築。萬春園因借舊有名園的規模，設計水平較高；水陸規劃較為自然生動，建築意匠趨向於小巧玲瓏。總而言之，圓明三園是一個極優美的園林作品，在湖溪、山石、殿閣、台榭之間，栽種無數珍貴花木，並收藏歷代保存下來的文物精華，被全世界讚美為「萬

²⁹ 《大清一統志》京師苑囿：「圓明園在暢春園北，世宗憲皇帝潛邸時賜園也。御極後稍加修葺，具朝署之規。門曰出入賢良，中曰正大光明殿，東曰勤政殿，為常時聽政之所。」

³⁰ 《大清一統志》京師苑囿：「綺春園在圓明、長春二園東南，先名交輝，為怡賢親王賜邸，又改賜大學士博恆。及進呈後，高宗純皇帝定名綺春。」

園之園」。不幸經一八六〇年及一九〇〇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的焚毀劫掠後，現在只剩下一個廢墟，所可看見的是許多巨大的石基、斷柱和殘垣！

香山是整個西山風景區中最美的一處，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晴雪」就在此處。香山在各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景色，秋季天高氣清，紅葉遍山；春天百花盛開，簇錦一片；夏期的雲霧，也頗有詩情畫意。因為地勢高，是避暑的好地方。早在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就在這裏興建了香山寺，作為皇帝的行宮。清乾隆十年（1745）進行大規模擴建，在此創造了二十八景，命名為靜宜園，作為皇家避暑消夏的離宮，與靜明園（玉泉山）及清漪園（萬壽山）合稱為「三山」。³¹靜宜園在香山東麓，環境幽靜陰涼，但園中原有的殿宇、台榭、亭閣、塔坊，都先後為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焚毀，只有少數磚石建築殘留。現存的別墅和慈善機關，多數是民國以後建造。屬於清代的名勝古迹，僅得昭廟和見心齋等。昭廟是一座喇嘛教建築，建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東面是一座琉璃牌坊，西面山腰有一座七層琉璃塔，每層塔檐上掛有許多銅鈴，靜山微風吹動，鈴聲清脆悅耳。見心齋在眼鏡湖的西南，初建於嘉慶年間，裏面有半圓形的大水池，池的西面有軒，其餘三面圍以迴廊。軒後兩側有假山和蒼翠的樹林；樹林中建有一亭，清幽雅靜。

北京兩處最著名的園林，西郊頤和園一帶大致是利用自然地形修築，城內的三海卻完全是人工建成；都依照造園的共同原則，利用樹木、山石及水面，把建築物 and 自然背景配合起來。位於舊城中心部分的三海，是一片廣闊的水面，不但具有調節局部氣候的功效，而且創造了大片開闊的空間。這對一個作為首都的大城，其存在就有很大貢獻。更進一步利用水面建造了風景優美的園林，在美化北京城區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北海在十一世紀中葉，便是遼代南京城郊的瑤嶼行宮。金代在此修築大寧宮，挖湖造山，堆築瓊華島；島上修建瑤光殿，島及湖岸點綴着樓閣亭台；又將北宋京城汴梁皇家園林的山石搬來疊砌假山。元世祖以此為中心修建大都城，把這片湖泊命名為太液池，改稱瓊華島為萬壽山；山頂築有廣寒殿，元代的許多大典皆在此舉行。萬壽山南太

³¹ 《大清一統志》京師苑囿：「清漪園在圓明園西，萬壽山之麓，乾隆十六年開濬西湖，賜名昆明，臨湖建園，名曰清漪。橋亭軒閣，雲布繡錯。正殿曰勤政。……靜明園在圓明園西，玉泉山下，康熙十九年建，初名澄心，三十一年改名靜明。……靜宜園在秀山，去圓明園十餘里，即秀山寺故址。聖祖仁皇帝於此置行宮，乾隆十年秋，重加修葺。既成，賜名靜宜，有御製《靜宜園記》，為景二十有八。」

液池中另有小島（即今日的團城，當時尚四周環水），島上建有儀天殿。太液池西岸建有興聖宮及隆福宮。明初大修宮殿，擴展中海又掘了南海，於是並稱三海，明清以來這裏一直是宮廷內苑。明代在太液池東、北、西岸都有所營建，並在北岸修築了釣魚處所五龍亭。清初順治八年（1651）在廣寒殿舊址修建了喇嘛塔（白塔），高六十七米，並將瓊華島南面的宮殿改建為佛寺。乾隆朝更大事修建，前後三十年間，增添了許多建築。白塔是全園構劃中心，站在白塔的台座上，天氣晴朗時可俯覽全城。山南寺院依山勢排列，從白塔前的善因殿到山腳岸邊的牌坊，直至團城承光殿（原儀天殿），氣勢連通，遙相呼應。山北亭、閣、廊、榭的佈局變化交錯，富有奧妙的自然情趣。山下傍水有長達三百米的半圓形遊廊，和對岸的五龍亭遙望。

在北海和中海之間，有橋分隔。此橋前身在元代為木橋，明代改建為石橋；兩旁闌楯，都是白石鑄鍊。東西兩端有牌樓對峙，東曰玉蝀，西曰金鰲，故此石橋又名金鰲玉蝀橋。走在這座橋上，南瞻北望，在平遠浩瀚的水面上，浮現出遠山近樹、亭台樓榭，自然和人工之美交相輝映，這在現代大都市中確是極為罕見的奇麗景色！解放後隨着城市的發展，交通頻繁，這座舊日石橋已不能適應現代的需要，故決定加以改建；在原有的基礎上把橋身放寬，引路提高；橋上除了廣闊車行道外，又在左右兩邊保留傳統藝術風格的石欄，增闢了平坦的人行道。這一帶舊日的宮廷內苑，現在已改成北海公園，面積廣達七十多公頃。

此外，清代又在北京附近各地修建了許多行宮，例如小湯山、八大處、石匣城、桃花山、南石槽、丫髻山、盤山和南苑等，而此等行宮概附有小園林。《大清一統志》及《順天府志》都有記載。《順天府志》卷四《昌平州》：「行宮在州東三十里湯山，康熙年間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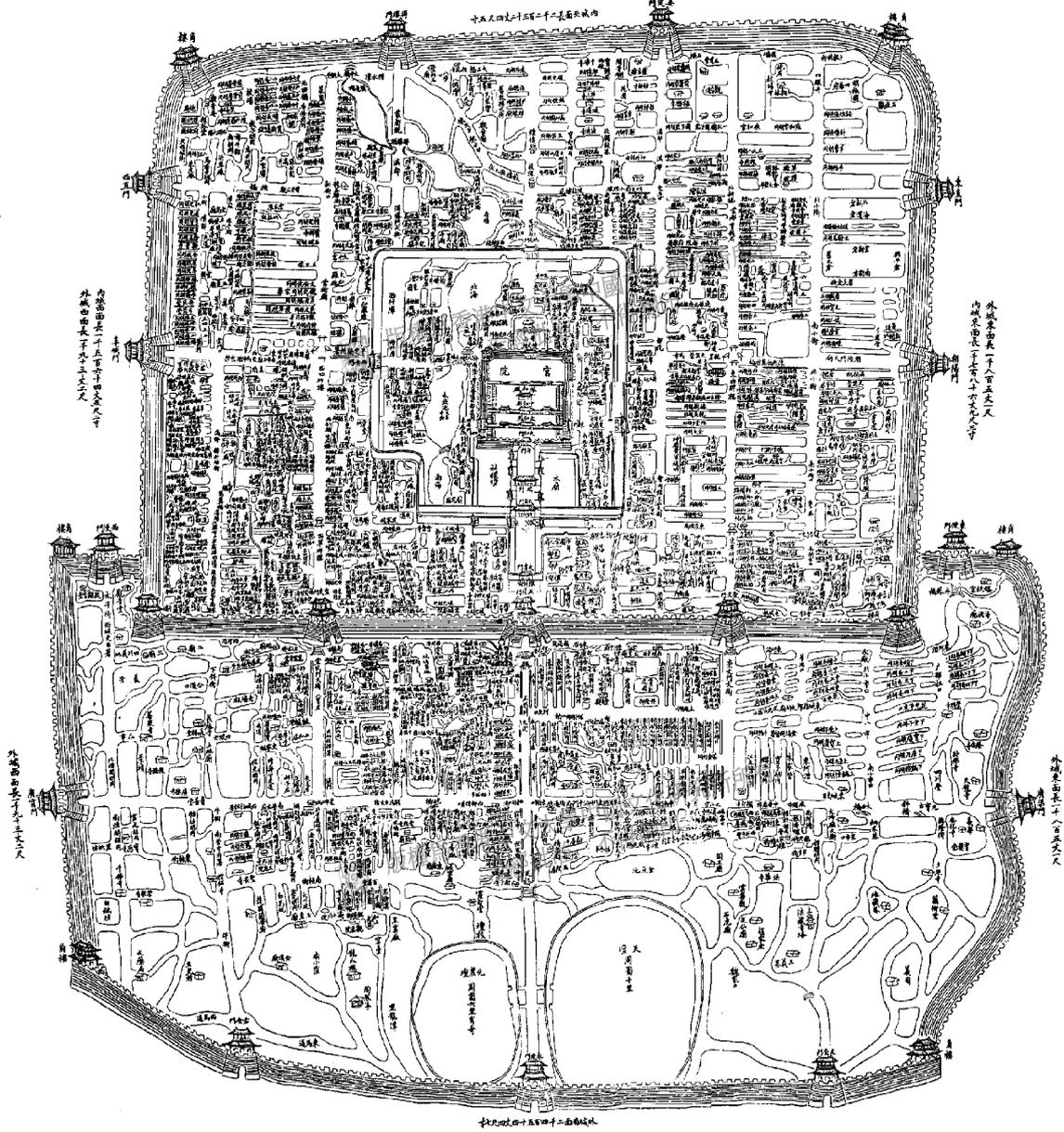
在此可附帶一提清代對北京地圖的測繪，這和城市建設及園林營造也不無關係。康熙是一個從少對地理很有興趣的皇帝，他曾通過西洋傳教士，大規模測繪中國地圖，包括費時三十多年的《皇朝輿地全圖》。但在正式進行之前，命令傳教士先測繪北京及近郊地區，作為試驗，並親自加以校勘。可惜當時所測繪的北京地圖，沒有能夠保存下來。

現存清代早期所測繪的大比例尺北京地圖，似乎只有《大清皇城宮殿衙署圖》（限於皇城以內部分）、乾隆時代的《北京河道溝渠圖》以及《乾隆京城全圖》等三種。³²

³² 已知的現存最早北京地圖，是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1593），《順天府志》的《北京城圖》，但比例甚小。《北京河道溝渠圖》原藏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又名《京都城內河道溝渠圖說》，一九四一年五月偽建設總署曾加以刊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京 城 內 外 首 善 全 圖



圖三 京城內外首善全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乾隆京城全圖》無疑為當時全世界最佳的都市地圖；原無圖名，比例為 1 : 650；據各方面考證，大約在雍正初年開始測繪，到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才完成。假設將該圖全部圖幅合併，則成為長十六米寬十三米的巨製。遠在二百多年前，能製成如此明細而準確的都市圖，實為世界地圖史上的奇跡。一九四〇年七月偽興亞院華北連絡部政務局調查部曾將此圖縮印，比例改為二千六百分之一，裝訂成十七大冊（十七排），題名為《乾隆京城全圖》，限印兩百部，列為非賣品，附有解說及索引。³³此一明細地圖，對北京城市發展的研究賦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五）近年的變遷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北京不再是帝國的首都。其後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在北洋軍閥的輪流把持下，北京雖仍為民國的首都，但可說沒有任何建設。一九二八年十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南京為首都，北京曾一度改稱北平，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城；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

從元朝建都起直到清朝滅亡，六百多年之間，作為全國首都的北京，發展是緩慢的。就登記的人口數說，一二七〇年時北京人口約四十萬，一五七八年時約七十萬，而一九一〇年也不過七十六萬。明、清兩代的北京，幾乎就等於內城加上外城，合計不過六十二方公里，城外居民甚少。事實上在內城和外城之中，直到解放前也還有一些空地。（參閱圖四）

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了北京人口的增長以及分佈的變遷。當時北京市的行政區劃面積，已由解放前的七百七十七方公里擴充為四千五百三十二方公里。普查結果全市人口為二百七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八十三萬居住內城，二十二萬居住外城，二者合計為一百〇五萬人；城外郊區的人口達一百七十多萬，遠較城區的人口為多。一九五三年時北京市的平均人口密度為每方公里六百一十一人。一九七五年估計人口接近八百萬，約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一，僅次於上海而為全國第二大都市。

³³ 陳正祥《中國地圖學的發展》，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第十八號，1969。

陳 正 祥

表 歷代北京的人口 (1270—1973)

年 份	人 口 數
元至元七年 (1270)	401,350
明弘治四年 (1491)	669,033
明萬曆六年 (1578)	706,861
清宣統二年 (1910)	764,657
1915	789,123*
1920	849,554
1925	1,266,148
1930	1,383,873
1935	1,564,869
1948	1,721,546
1953	2,768,149**
1958	4,148,000**
1973	7,750,000(估計)

* 北京市的人口，從1912年起有比較準確的數字，該年人口數為 725,235 人。

** 行政區劃擴大，人口隨之大增。1958年10月劃入鄰接四縣後，人口即超過 650 萬，1963年估計為 730 萬。

資料來源：《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大清一統志》、《北平市公安局統計年報》、《第一次全國人口調查報告》以及《聯合國人口年鑑》等。

北京市的行政區劃，一九五二年以來曾有過五次的擴大和調整，現有九個區和九個縣。³⁴九區的名稱為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陽、豐台、海淀、門頭溝和石景山；

³⁴ 1952年擬訂發展北京市的二十年計劃，準備將市區擴大七倍。該年九月劃入宛平縣全部以及房山、良鄉兩縣的部分區和村，使市區面積從解放前的 777 方公里增加到 4,532 方公里。同時將市轄區調整為：東單、東四、西單、西四、前門、崇文、宣武等七個市區和東郊、南苑、豐台、海淀、石景山、京西礦區等六個郊區。1956年3月，劃入昌平縣，改稱昌平區；並將通縣所屬金盞等七鄉併入東郊區。1958年3月，將通縣、順義、大興、良鄉、房山五縣及通州市劃歸北京市，使市區面積再擴充為 8,770 方公里。同年五月，重新調整全市行政區域：(1) 撤銷通州市和通縣，併設通州區；(2) 撤銷房山、良鄉兩縣，併設周口店區；(3) 撤銷南苑區和大興縣，併設大興區；(4) 撤銷石景山區，併入豐台區；(5) 撤銷前門區，自前門樓西邊城門起，沿正陽門大街西側至珠市口，以東劃歸崇文區，以西劃歸宣武區；(6) 撤銷順義縣，改設順義區；(7) 撤銷東單、東四二區，併設為東城區；(8) 撤銷西單、西四二區，併設為西城區；(9) 京西礦區改稱門頭溝區；(10) 東郊區改稱朝陽區；(11) 昌平、海淀二區不變。共設十三個區。1958年10月，將懷柔、密雲、平谷、延慶四縣劃歸北京市。1960年又將前所撤併的大興、順義、昌平、良鄉、房山、通縣六個縣及通州市，除良鄉縣和通州市外，一概恢復原建制。

北京的都市發展

71

九縣是昌平、懷柔、平谷、大興、延慶、順義、密雲、通縣和房山。全部土地面積爲一萬七千八百方公里，約畧相當於荷蘭的一半或阿爾巴尼亞（Albania）的十分之六。爲日本東京都面積的八倍多。³⁵

北京城雄偉的城牆，被認爲有碍現代化都市的發展，經過長期的爭辯之後，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以後逐漸全部拆除，改築成坦蕩的大道，只留下少數幾座城門作爲紀念。現在中心市區已突破了舊城圈，從而使舊北京城的古老格局，起了徹底的改變。中心市區擴充之後，爲了便利和郊區的聯繫，減輕市內運輸量的負擔，環繞舊城之外，修建了環路，如東環北路、南環東路、北環西路等。在環路以內基本上保留舊棋盤式的道路系統，只是着重開拓聯繫東西兩城區間的幹路，打破舊北京城東西之間的半隔絕狀態。此外在舊日的內外城之間，由於城牆的拆除，又加築了一條寬濶的新幹路，用以分擔過去集中在東西長安街上的交通運輸量。至於舊城圈以外，通向遠郊區的交通幹線，則採取了放射狀的形式。（參閱圖五）北京市鋪裝道路的面積，已從一九四九年的二百一十九萬平方米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一千四百萬平方米。

數百年來，北京城的平面佈局一直由那條南北向的中軸線所支配，但現在已改由一條東西向的主幹大道所代替。這條新的大道以天安門廣場爲中心，向東到通縣，向西到石景山，平直寬濶，全長達四十公里。這條大道築在古代永定河洪積、沖積扇的背脊上，地勢自西向東逐漸傾斜，和金代開鑿的金口河流向約畧一致。

在經濟方面，北京本來是一個典型的消費城市。³⁶但近年新建和擴建了許多工礦企業，不但輕工業，而且連重工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使北京變成一個新興的重要工業基地。過去的一些荒棄郊區，今天已改變成爲工業區。目前全市已建成包括冶金、煤炭、電力、機械、儀錶、石油、化工、紡織、輕工業等比較齊全的工業門類；工人超過一千名的大工廠有二百多個（戰前工人超過五百的工廠不到十家）。一九七四年全市工業總產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一百二十倍。一九七四年北京市輕工業的總產值超過一九六五年全市的工業總產值，同時對整個工業的發展積累了更多資金。一九七四年北京市重工業的總產值，比一九六五年增加近三倍；全市工業上繳國家的利潤增加四倍多。解放前北

³⁵ 據1972年日本總理府統計局出版《日本統計年鑑》所載，東京都的土地面積爲2,141.11方公里（市部佔1,300.93方公里，郡部佔840.18方公里），居民11,531,000人。

³⁶ 不難想像的，像北京這樣的一個古都，廣集了大批貴族、官僚、軍閥、買辦之流的遺老遺少，大多數是不能生產的頹廢分子。據1936年的調查，北平市無職業的寄生者，竟佔總人口的十分之六。

京不能煉鋼，現在北京一年的鋼產量就比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的總和要多十倍。蘊藏豐富的京西煤田，早在元明兩代就已開採，³⁷近年得到了發展；一九七一年全市的煤炭產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近五倍。舊北京不能製造機器，現在已能成批生產汽車、機床、以及電站、化工、礦山和鍛壓等多種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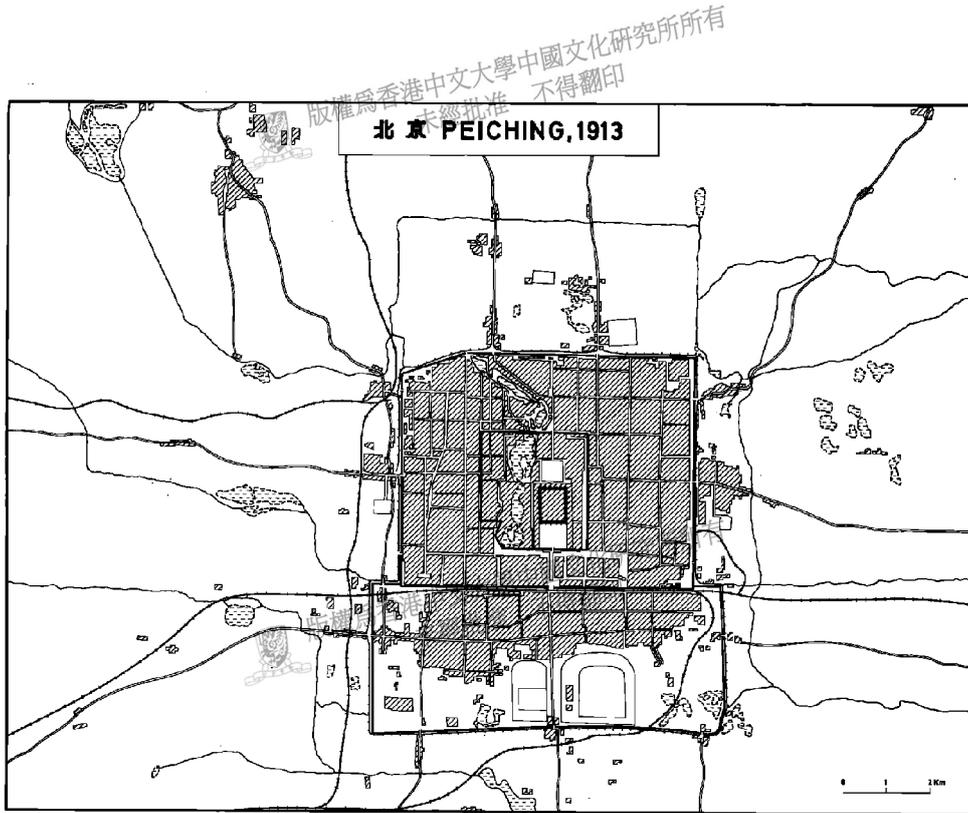
北京剛解放時既不能紡紗，又不能印染紗布。後來連續興建了一批大型的紡織廠、印染廠、毛紡廠。現在北京生產的棉、毛、絲、麻、針織、印染、化纖等紡織品，已有數千個花色品種。其他輕工業品也日益豐富多采，品種在六千種以上。北京市場上輕工業品的自給率，已由一九六五年的48%提高到一九七二年的71%。在發展新工業的同時，北京也加強了老企業的改造。著名的特種手工藝品，如景泰藍、玉器、象牙雕刻和地毯等一百八十多種，都走上了合作化生產；經過推陳出新，發揚優美傳統，式樣精美，不斷創新。

在建設大型現代化工業的同時，北京還積極發展中小型企業。一九七一年全市小型工廠的產值，相當於全市工業總產值的十分之一左右，產品達一千八百多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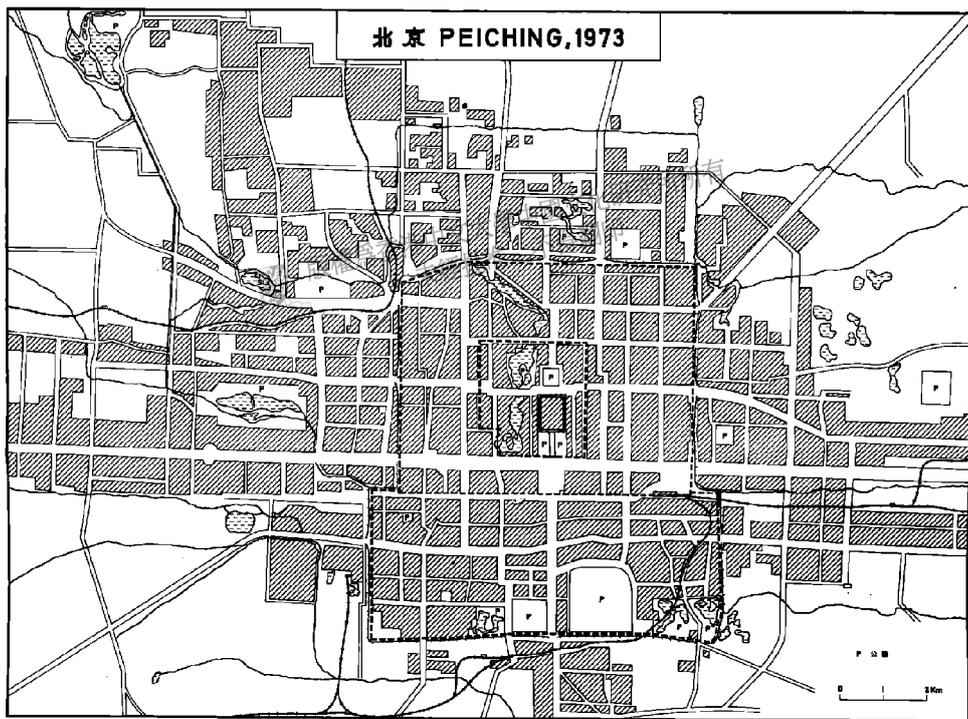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時，北京的建築面積約為二千一百萬平方米，一九七三年時則達七千五百萬平方米，而且大部分為多層建築。換言之，二十多年來新建的政府機構、工礦企業、醫院、學校、商業以及展覽館等建築的總面積，相當於新蓋了兩個半的舊北京城。³⁸隨着工業、交通和文教、衛生事業的發展，在北京城郊新興的工業區建造了大批工人住宅。例如最近建成的北京石油化工總廠，就建起了十一萬平方米的住宅樓。綜計新建的規模較大、生活設施齊全的工人住宅區，共有三十多個，包括三里河、十里堡、龍潭和酒仙橋等處。其中不少是在過去荒野、臭水溝和葦塘上建立起來的，皆設有食堂、醫院、學校和娛樂場所，通公共汽車或無軌電車。到一九七二年時全市新建的住宅共達二

³⁷ 《元一統志》卷一大都路土產：「石炭煤，出宛平縣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餘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溝，有白煤十餘洞。」關於北京煤的開採和使用，在西山和門頭溝一帶，明代中葉之後，民窯已相繼出現。宋啓明《長安可游記》：「由門頭村登山，數里至潘闌廟，三里上天橋，從石門進，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為生。」足見當時煤的開採和民間以煤代薪已很普遍。

³⁸ 關於新建房屋的用途，只找到1958年的一個統計資料。到該年年底為止，全部新建房屋面積為2,500萬方米，其中工廠用房350萬方米，佔14%；職工宿舍和市民住宅計1,080萬方米，佔43.2%。新建的高等院校33所，建築面積140萬方米，佔5.6%；中小學校60萬方米，另佔2.4%。醫院門診部70萬方米，佔2.8%；娛樂場所60萬方米，包括十七個能容納800-1,600人的電影院和劇院，另佔2.4%。1958年一年之間所建的房屋達450萬方米，其中工業用房130萬方米，高佔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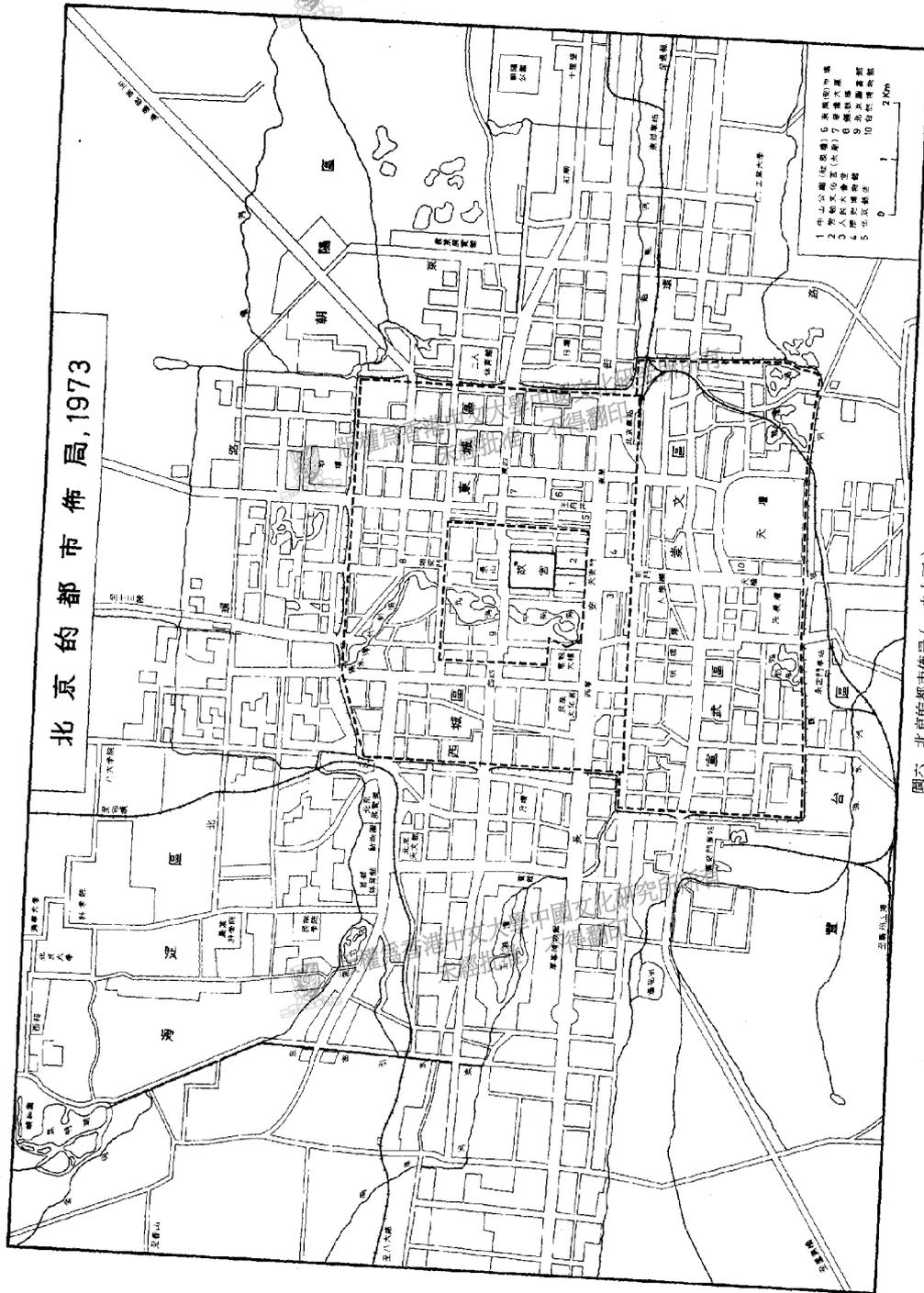


圖四 一九一三年時之北京



圖五 一九七三年時之北京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千二百萬平方米。³⁹在建築新住宅的同時，政府的房屋管理部門還為五萬五千戶勞動人民拆除了八萬多間舊的房屋，使他們住進十二萬間翻新的樓房。

原先一些著名的貧民窟，像龍潭湖、龍鬚溝和金魚池等，都已經過徹底改造，淤塞了的河湖全部加以疏浚，臭氣薰天的深溝已經填平，所有的污水溝都改為大口徑的地下水道。全市現在下水道的總長度達一千一百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五十倍。⁴⁰自來水管也通到了每個住宅區。

市內新建的道路長達二千公里，約為原有道路的五倍，而且質量也大為改善。北京過去因路政敗壞，故向有「無風三尺土，有雨滿街泥」之諺。柏油或柏油石渣混凝路只有一百五十六條，全長不過一百九十二公里；而且都集中在東單、西單一帶所謂「富貴之區」。據一九五三年的一個統計，北京市共有三千一百七十七條街道及胡同，⁴¹全長七百五十五公里。北京的胡同，從前全是泥路，現在則已改成水泥路面或瀝青路面。

³⁹最近為應付外交形勢的新發展，包括外賓和遊客的激增，北京的房屋建築正加速進行。僅1973年一年，就有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二千四百餘起來到北京。據新華社北京1973年12月31日消息：「首都基本建設戰線今年勝利完成了工業、科研、民用和外事方面的一批重點工程。一年來，全市房屋建築竣工面積比1972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1973年1月正式開放的國際俱樂部，佔地14,000平方米，包括網球場、文藝廳、宴會廳、影劇院和露天游泳池等。1974年9月落成的新北京飯店，高17層，地下還有三層，建築面積8.8萬平方米，位於東長安街和人民路（原王府井大街）的交口，是目前北京最高的建築物，也是最現代化的旅館。

⁴⁰過去北京雖號稱首善之區，但多數的街道很污濁。下水道雖說有287公里，但幾乎全淤塞了，能排水的只剩21公里。天橋以南的貧民住宅區，每逢雨季，廁坑裏的糞和蛆都往外流；積水嚴重的時候，上街着要划門板出去。前清一位大臣在給皇帝的奏摺裏寫道：「大雨淋漓，前三門外，水無歸宿，家家存水，牆倒屋塌。每當暑雨蒸潮，黃潦滿街，濁污流溢，民間痼疾大作。」一些湖泊，淪為孳生蚊蠅的葦塘。著名的陶然亭，只是一潭臭水幾堆荒墳。1949年一年內，北京市衛生局取消了城內的糞坑、糞箱、糞廠890個，把所積存的大糞約61萬噸搬到城外，大大改善了衛生環境。1952年整修掏挖完畢全部下水道，使其恢復作用；1958年全市下水道已長達848公里，包括新建的561公里，其管徑和工程質量皆遠非舊日的下水道可比。

⁴¹北京的胡同，其名稱頗有地理意味，就明嘉靖時張爵所著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所列，有些可以反映當時手工業和商業的概況。如燒酒胡同、皮褲胡同、法瑯胡同、麻繩胡同、油房胡同、棉花胡同、弓弦胡同、棧棧胡同、冠帽胡同、手帕胡同、絨線胡同、茶葉胡同、麻線胡同、柴胡同、香胡同、醋胡同、炭胡同、鷄胡同，乃至豆腐陳胡同、曹杉板胡同、金帽兒胡同、孔砂鍋胡同、沈篋子胡同、馬絲綿胡同等。據明代沈榜《宛署雜記》的街道篇說：「北京城內地方，以坊為綱，每坊舖舍多寡，視廬居有差。總計坊凡十有三，其以衞衛名者，凡三百十二。衞衞本元人語，字從胡從同。」又清人朱一新《京師坊巷志》說：「京師坊巷，大抵襲元、明之舊，其以職業區別名者，如米糧局、染織局、琉璃廠、東江米巷、驛馬市大街、煙袋斜街、金魚衞衞、劈柴衞衞、弓弦衞衞等。……」

街道很整潔，無論大街小巷，都看不到垃圾、紙屑和果皮；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市政辦理得好，另外也得力于老百姓自覺地養成了保持城市清潔的習慣。大街由市環境衛生局派出灑水車不停地沖洗，小街橫巷則由住戶、商店負責清掃門前；在國慶節、勞動節等大節日來臨前，還要舉行全市大清掃運動。北京剛解放時，垃圾充斥街頭；城牆邊所堆積的垃圾，幾和城牆齊高；連天安門廣場也堆有垃圾。新政府隨即開展城市清潔運動，全市人民一齊動手，在三個月內清除了二十多萬噸垃圾。一九四九年全年清除的垃圾達三十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噸。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又展開熱火朝天的愛國衛生運動，連故宮裏、狀元府裏明清兩代遺留下來的古垃圾也給掃除了。目前北京市每天清除的垃圾約為二千七百噸。

公共交通事業發展得很快，一九七二年底全市公共汽車和電車的行駛線路達一百九十四條，營業線路總長度為七千六百二十七公里。（一九六三年的相應數字為一百七十七條和二千五百公里）舊北京的有軌電車，在一九二四年開始營業，當時共有電車九十輛，基本上為外國商人所操縱，一九四八年時電車反減少為四十九輛。一九三五年開始有公共汽車，約有汽車三十輛，一九四八年卻只剩下五輛。那時全北平市的公共交通線路僅六條，總長度才四十一公里。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車和人力三輪車，也可看到駱駝和騎驢趕廟會的。如今人力車已經絕迹，人力貨運三輪車也逐漸換成機動三輪摩托車。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現無軌電車，到一九六六年已完全代替了有軌電車。無軌電車無噪音，不必路軌，沒有廢氣污染。這是一項很大的改進。

一九七二年底北京全市公共汽車和電車的車輛總數已經是解放初期的三十八倍，⁴²線路總長度更增加了一百八十六倍。同年全市客運總量為十一億八千萬人次。一九七三年春節（農曆新年）的頭尾五天，全市客運量超過二千萬人次；相當於舊北京公共交通的全年客運量。一九七五年有公共汽車和電車二千六百輛，每天載客四百萬人次。

遠郊的長途公共汽車線路，已從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三條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一百零七條；其中一九七〇年便增開了二十三條，合計一千六百公里。現在北京市郊區的縣和公社之間都有了公路，除極少數地處深山的公社外，都通了公共汽車。

北京交通的一個特色是私用汽車絕少，腳踏車特別多。腳踏車或稱自行車，機動靈

⁴² 據1972年日文《人民中國》十月號的報導，1970年北京全市有無軌電車440輛（1959年為317輛）、公共汽車1,260輛（1959年為951輛）、長途公共汽車203輛（1959年為114輛）、出租汽車735輛（1959年為589輛），合計為2,638輛（1959年為1971輛）。

北京的都市發展

75

活，又很經濟；經常騎車可代替運動，增強體質。一九七二年底全市共有腳踏車一百七十五萬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十二倍多（當時只有十四萬輛）。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北京全市所增加的腳踏車就達一百萬輛，平均每月增加八千輛。清早和傍晚，腳踏車的車流，蔚為奇觀。西單的腳踏車流量曾達到每小時一萬零三百輛；而通過東四、東單、虎坊橋等處的腳踏車，每小時也達八九千輛。現在一般工人、農民家裏都有腳踏車，有的一家就擁有好幾輛。為了方便人民，保證交通安全和道路暢通，維護首都交通秩序，有關部門在公園、電影院、體育場、商場、機關、廠礦等公共場所附近設立存車處。全市還設有一百九十七個腳踏車修理門市部。

北京是中國第一個有地下火車的城市。這個地下鐵路系統在一九六五年七月開始建築，一九六九年十月完成首期工程。以北京火車站為起點，通到石景山區的蘋果園，全長二十三公里，共分十六個站，站台都用大理石鑲砌，每站的色澤不同。站台分為三級，其中有三個一級站，亦即北京火車站、前門站和軍事博物館站。路線大部分和長安街的西段平行，最東一段沿原來的南城牆修築，上距地面約二十米。車輛由長春的機車廠製造，最高時速為八十公里。普通是四卡車廂相連，每卡車廂有座位六十個，行車時間由上午七時到下午七時，每隔十五分鐘開車一班。每日乘客約四到六萬，星期假日則超過七萬。北京市內的防空地下壕，一部分和地下火車站連通。目前正進行環城線和十三陵支線的建築。

供水會成為北京市發展的一大問題。元世祖定都北京後，為了皇室取用飲水，曾將西郊的金河、長河列為御河，禁止老百姓在河裏洗手洗衣。清朝皇宮用水，每天派水車到西郊玉泉山載運。當時北京城內絕大多數居民，只能飲用苦澀的井水。由於嚴重的缺水，人們把水看得很貴重，因此有不少以井為名的街道胡同，例如羅家井、姚家井、一眼井、甜水井、苦水井等。直到一九一〇年，北京才開辦第一家自來水公司——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但是這家自來水公司的供水量很少，供水範圍只限於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和前門外一帶的富商。一九四八年時，北平市使用自來水的人口為六十一萬（一九四九年底為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五戶），僅佔當年全市總人口35%；每人每年的平均供水量為十三·三噸。平均每日供水量約為三萬噸。一九五八年時，北京各種水源井的總出水量已增至每秒四噸半，用水人口增加到二百九十萬，平均每日供水量為二十三萬六千噸，相當於一九四八年的七·八倍。尚未包括出水量每秒三噸多的自備水源井的供水量。

一九六三年時北京的自來水廠已增加到十座，平均每日供水量超過四十五萬噸。城

區居民之中，已有99.7%飲用自來水；而且近郊區居民和部分遠郊區居民，也用上了自來水。解放前，北京全市沒有一個公共自來水站，而現在城區和郊區一些農村，設有公共自來水站一千七百多個。解放前全市所鋪設的自來水管道，全長僅三百多公里；從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年初，增設管道達七百六十六公里，到一九六三年又增至一千四百多公里。自來水費也很便宜，每噸的價錢只相當於解放前的四分之一；⁴³在公共用水站取水的居民，每人每月只需繳付水費幾分錢人民幣。自來水廠有最完善的消毒和檢驗設備，採用最先進的消毒和檢驗方法，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水的質量。

北京城自古以來的一個理想，就是要開鑿一條人工渠道，從石景山附近引永定河水，穿過北京城區，再經過通縣城下會注潮白河。金代所開的金口河，近年完成的「永定河引水渠」，正是此一理想的實現。永定河引水渠的渠口在三家店，這裏築了一條長二百四十三米的攔河閘，共計挖土三百萬公方，灌注混凝土四萬公方。渠道從三家店到西便門，全長二十五公里；中間穿過模式口山頭，鑿了一條六百八十五米的隧洞。從三家店到雙槐樹村一段，完全是新開渠道；自雙槐樹以下到西便門，利用原有的南旱河道加寬加深。第一期工程完成後每天有一百五十萬噸河水流入北京，初步保證了北京市的工業和生活用水，並進一步改善了首都的環境衛生。此外「京密引水渠」的開鑿，又把潮白河上游的水引進了北京城。這也是在前人設想的基礎上再加以發展，首先是把密雲水庫的水引向昆明湖，然後在西郊玉淵潭的上游和永定河引水渠會合。這就形成了首都新市區給水系統的主幹，並有利于園林的營造和佈局；紫竹院公園內的湖泊，便因此獲得了新的水源。

北京的第一家電燈公司創辦於一九〇五年，發電總能量僅三百六十瓩；所發的電只供應前門外大柵欄一帶的商店和飯館的照明。⁴⁴英國人和荷蘭人相繼承辦的瑞記電燈房，規模更小，只供應東交民巷的外國駐華使館和北京飯店。一九一九年華商電燈公司在石景山建立發電廠，發電量才有較大的增加。但直到一九四八年，北京全市實際用電負荷也僅三萬瓩左右，一九四九年所發的電僅一·五億度，只能滿足少數人的需要，許多老百姓家裏根本沒有電燈。解放後建設了好幾座大型電力廠，郊區也修建了很多小型

⁴³ 北京市的自來水價曾用小米來折算。1949年2月，每噸水價折合2斤小米；5月份減為1.5斤小米。12月份住戶、機關、部隊、學校用水又減為1斤小米，公共用水和澡堂用水為0.75斤小米。

⁴⁴ 早在1905年華商電燈公司創辦之前，以搜括民財供個人享樂的著名惡婆慈禧，就在北京西城府右街銜銜房辦了個電燈房，專門供應當時皇宮的用電。

水力發電站，到一九五八年電力生產已增至一〇·五億度，於是北京家家戶戶都有了電燈，大街小巷都裝了路燈。一九七二年時，北京市電力工業局系統的發電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五五·六倍，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92%。換言之，一九七二年北京市電力工業局系統的發電量已經超過八十三億度。另據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新華社北京消息，首都一九七四年的發電總量，較一九六五年增加二·七倍。

北京春季原多風沙，根據氣象觀測記錄，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之間，平均每三天便有一次風沙；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之間，平均每四天半有一次風沙。其後逐漸減少，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間，平均每八天有一次風沙；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間，平均每十一·一天半才有一次風沙，最近似乎很少風沙了。此項顯著的成就，和全市大規模的造林有關，特別是北郊沙荒地區林帶網的建成。

北京市的綠化工作作得極好。廣大群眾積極展開植樹造林活動，目前城區已植樹二千四百萬株，比解放前增加三百七十倍；郊區植樹達二百萬畝，育苗五萬多畝。在永定河和潮白河等主要河流兩岸，過去共有三十多萬畝沙荒，根本沒有樹木，成為風沙危害北京的主要根源。⁴⁵近年市民在總長一千多公里的河床兩岸，栽了固沙防護林，使多年威脅北京的沙龍，已基本被鎖住。現在這些河流沿岸，只見一條條綠色的林帶，絕少再有飛沙走石的現象。

解放之初全北京城只有六萬四千株樹，其中近五萬株分佈在帝王宮苑以及私人花園中；而且附近的山地，天然樹林也砍伐殆盡。後來市民把植樹造林作為改造首都城市面貌的主要措施，全市各個區、縣都成立了負責植樹造林的領導機構。每年有數十萬的工人、學生、幹部等分批上山下鄉，和郊區人民公社社員一起綠化山區、公路和河岸。僅一九七一年春季的一次造林活動，全郊區就植樹一千八百萬株，市內植樹一百二十萬株。估計全市已被綠化的面積，超過十萬公頃。站在景山高處遠眺，北京城區像是一片鬱鬱蒼蒼的林海。有些林蔭道路，兩側樹木的枝葉相接，行人車輛好似在綠色的天棚下通過。新開闢的公園和綠地，達四十多處，總面積比原有公園擴大了八倍以上。若干舊日皇家花園，經過修整改建，也都變成了公園。現在全北京共有五十多個公園，總面積

⁴⁵ 靠近潮白河的北河村，在1931年的水災後，二千多畝農田變成了沙荒；而且風吹沙移，沙荒面積逐年擴大。1955年秋天，辦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連成了一片，開始營造農田防護林。十三條各寬6米的主林帶，阻攔從西北來的沙風；另有六條與主林帶成垂直的副林帶，把全部農田包圍起來。林帶長得愈高，風沙之害越少；肥土不再被風吹失；再加上其他措施，1963年的每畝糧食產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比造林前增加了兩倍多。

達二千八百公頃。所有公園的植樹數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五十多倍。工廠、學校、機關和住宅區，也普遍地進行了綠化。

(六) 職能區分

北京近年發展得很快，都市建設顯然按照一定的計劃進行，專門設有都市規劃局，局裏也有好幾位地理學家。但我們看不到北京市的都市計劃，其他的有關資料也絕少發表；按地區詳細劃分北京的都市職能（function），存在着許多困難。就廣泛閱讀所得到的零星知識，只能對北京市的職能區分劃出一個粗畧的輪廓。

就原始的土地利用職能說，宮城是皇帝及其家屬起居地區，皇城是為皇室服務的機構和國家的行政機構所在；內城和外城則為居民及商店的分佈地區。城區核心的故宮，其主要部分完成於一四二〇年，繼承中國宮殿建築藝術的精華，成為中國都市建築史上無比的傑作。全部建築共有四百零三座，計為殿八十六座、宮四十八座、樓閣二十三座、館二十二座、齋十五座、室十四座、堂九座、軒七座、台（觀樹）十座、亭四十座、坊十座、門一百二十二座。

皇宮早已改為故宮博物院，它的東邊是繁華商業區，包括王府井大街的百貨大樓、北京飯店、東風市場和兒童藝術劇場（原北京劇場）等。西邊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等重要行政機構以及黨和國家最高級首長的住宅區。南邊是勞動人民文化宮（原為太廟）和中山公園（原為社稷壇），北邊是景山公園，設有少年宮。景山公園以西是北海公園，海中有自古著名的瓊華島，西南岸有北京圖書館，藏書接近千萬冊，內有善本典籍二十多萬冊；非但是全國最大的圖書館，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之一。天安門以南為主要的行政區，中央各部會和全國性重要企業的管理機構集中在此處。天安門廣場已從十一公頃擴充到四十公頃，成為市民政治集會的場所，其影響常是世界性的。廣場兩旁有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宏偉壯麗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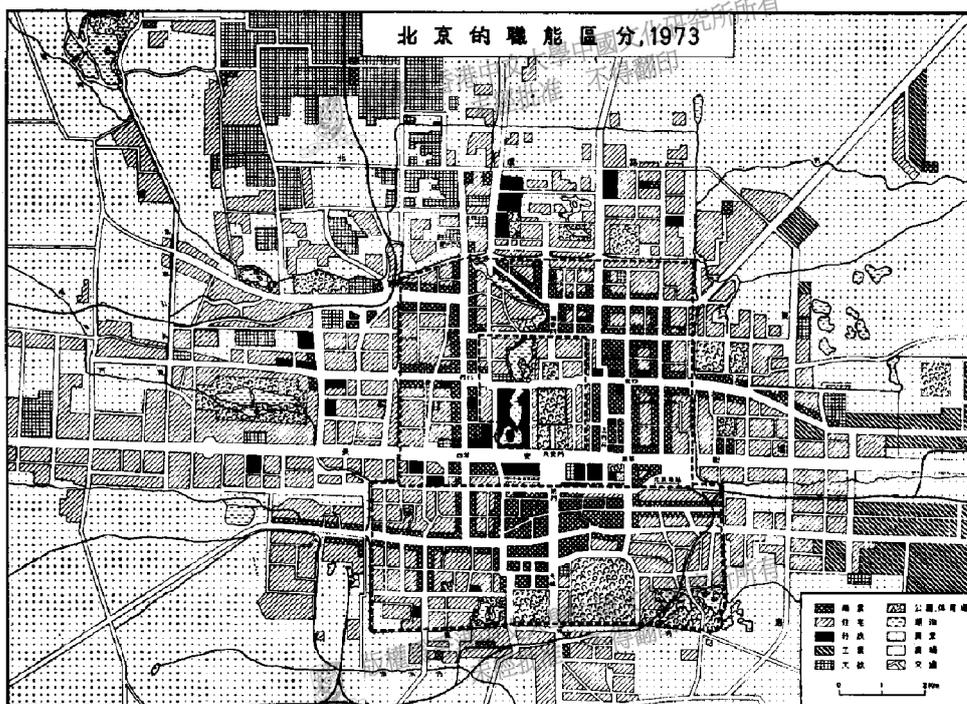
外城的中部偏西，也就是前門大街和天橋南大街以西，形成另一主要商業區，有許多劇院、電影院、飯館、著名的老商號以及中等的旅店。前門車站已經拆遷城東建國門內，改建為新的北京火車站，佔地十二公頃，一九五九年建成，為當時北京十大建築之一，平均每日接納二十萬名旅客。外城南邊的天壇，現已改成為大公園。天壇西南有陶然亭公園，二者之間有先農壇和北京市體育場；天壇東側有龍潭湖，也已闢成公園，二者之間有北京體育館和跳傘塔。龍潭湖原為北京城東側及南側河水匯集之地，夏秋一片滂瀟。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發動市民在此挖土築岸、引水、植樹、養魚、種蓮。現在火

北京的都市發展

79

車一進入北京市區，首先就從這個大公園穿過。

環繞上述內外城各地區的是舊住宅，一九四九年北京全部住宅面積為一千三百公頃，共有房屋一百一十八萬多間；其中 95% 是灰色的單層平房，三分之二非常低矮破舊，和金碧輝煌的宮殿以及豪華的王府第宅，形成很不調和的對比。舊北京原有「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說法，這就指官僚、貴族、有錢有勢的人，大多數住在宮城的東西兩側；而舊城僅有的一些現代化公用設施，如自來水、下水道等，也就都設置在這一帶地方。勞動人民則擁擠在南城及北城的狹窄污穢的胡同裏，喝的是苦澀的井水，連地下水道也沒有。



圖七 北京的職能區分

北京城內的舊住宅大體上都由一個或若干個四合院所組成。四合院是傳統的單層平房，具有防衛性能，符合宗法社會大家族生活的要求。四合院的基本形式是由坐北朝南的正房，坐南朝北的南房和東西廂房，四面房屋圍成的南北稍長的矩形封閉庭院。宅門一般開在東南角上，但有時也因為所處的街坊位置和建築面積的限制而有改變。如果建

築面積狹小，則可能形成三合院的格式（除正房和兩面配房外，其餘一面只作圍牆）。庭院是四合院佈局的中心，是交通、採光、通風的樞紐，並且也常是休息和作家務的場地（如夏日乘涼、作飯、堆置雜物以及晒衣服等）。

一般市民都居住一個單位的四合院或三合院，建築比較簡單樸素。房屋為木構架包以磚牆，牆面多用碎磚填心，外面抹以白灰。柱、樑、枋、門、窗、外檐的油漆，多採用紅、綠、黑三色。比較高大舒適的正房由家長居住，廂房分住兒孫。中型或大型的住宅，則常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體四合院組成，沿一條軸線排列，形成一連串的幾進院落，有的還在兩側伸出跨院。此種高等住宅的營建，應用高質量的建築材料和雕磚、雕木、彩畫、刻石等精細工程。宅門有高起的門道，多數擺在主庭的中心軸上；大量應用彩畫、雕磚等華麗的裝飾。大門左右、門前及門內都設有影壁，兩側有上馬石或石獅擺設。進大門後的前院和主庭之間，都設有二門。主要房屋都帶有前廊，並用遊廊把四面建築連接起來；作為各個建築之間的交通聯繫，也有避雨的功用。大型多院住宅常附有花園，花園一般建築在住宅的後面和側面，中間有牆門和住宅相通。近年以來，很多四合院內部已改建為西式的了。

北京的都市規劃，大致是以舊城為中心向四郊擴充；改造舊的，發展新的。隨着生產事業的發展，成片的新住宅區在舊城的四周興建起來，舊城內的破舊房屋正在逐步進行改建和修繕。新住宅多數是三至五層的樓房。在新住宅區內，有計劃地配置了生活福利設施，包括商場、學校、醫院、郵電局和娛樂場所。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內，北京總共興建了二千多萬平方米的住宅，相當於舊有住宅的一·六倍。許多昔日的荒墳、葦塘和臭水坑，都變成了樓房成片的新村。例如東直門外的酒仙橋，一九五三年前原是一片荒地，渺無人烟；後來由於工業建設，出現了一幢幢的工人宿舍。朝陽門外的十里堡，一九五四年以前尚甚冷落，但不久便形成了工人新村。為了適應城外居民的需要，除傳統的商業中心外，還在郊區新建了許多綜合性商場，每座的建築面積皆達一萬平方米。新建的娛樂場所（一九六五年北京共有劇場和電影院一百零六所，座位十萬零六千個），大多數分佈在住宅區。許多工廠有自己的電影放映隊，經常招待職工及其家屬。

舊北京也像中國其他城市一樣，存在着住宅、商業混合區。住宅區臨街的一面，有許多小商店；還有些是底層作生意，上層作為住宅。但在新的住宅區和文教區，商業採取配套的形式；在適當地區建立綜合性商場，包括百貨店、飲食店、書店和市場等。在舊城區中心的鼓樓底下，建有頗具規模的地下商場。此外在主要街道，每隔一定距離，設有夜間服務商店，通宵營業，便利夜班工人。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故宮雪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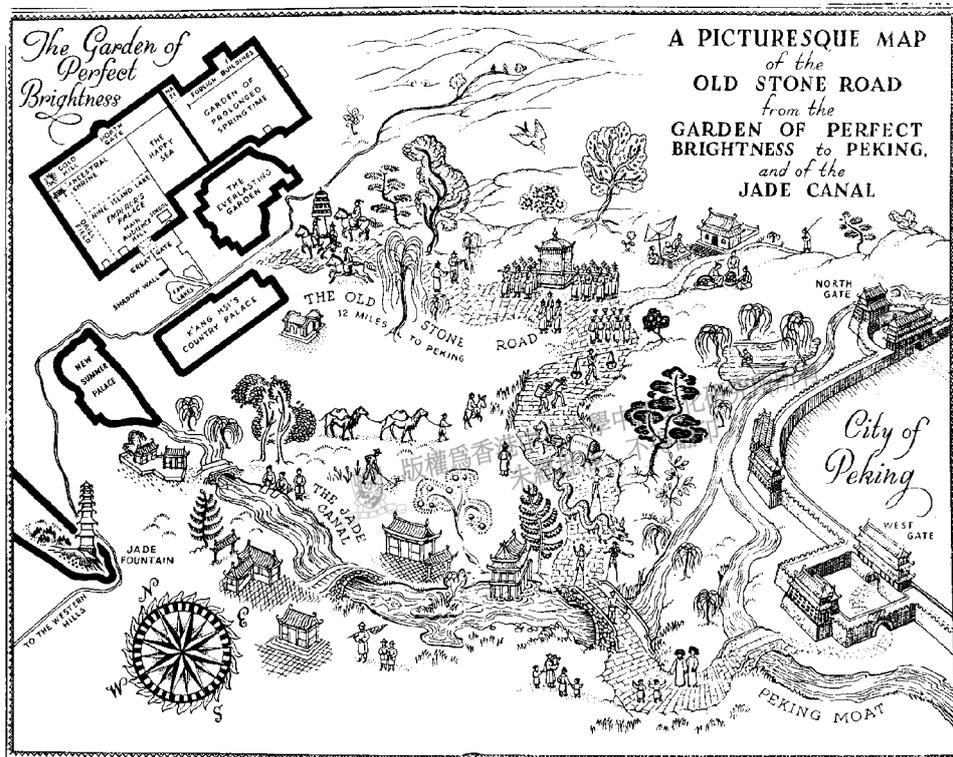
故宮主體太和殿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頤和園和昆明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清代北京西郊的三園 圖中K'ang Hsi's Country Palace 即暢春園，是西郊最早經營的園林。它北邊的Everlasting Garden即綺春園；再北邊的Garden of Prolonged Springtime為長春園。長春園西側的Happy Sea即福海，北側的Foreign Buildings 便是西洋樓閣群組和噴泉等西式園林建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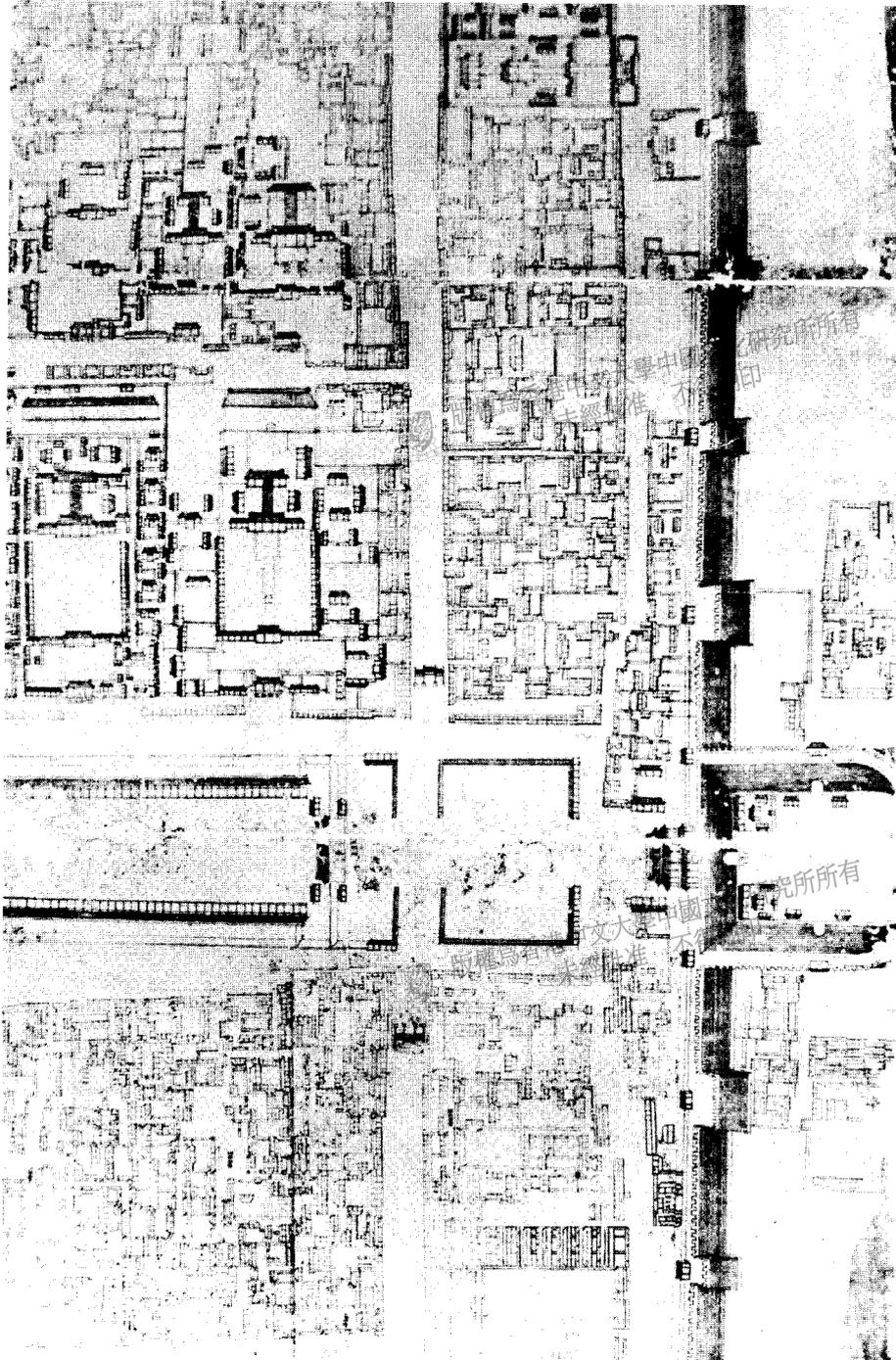


天壇祈年殿



今日的天安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乾隆北京詳圖 原圖無名，比例為1：650。據各方面考証，此圖的測繪約開始於雍正初年，而完成於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假設把所有圖幅合併，則成長14米寬13米的巨製。遠在二百餘年前，能製成這樣明細而準確的都市圖，實為世界地圖史上的奇跡。1940年時，此圖曾經縮印，比例改成1：2,600，訂為17大本，題名乾隆京城全圖。此處有鑿城的城門為正陽門，向北通達皇宮。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因為北京多吹北風和西北風，而河流也從西北趨向東南；為了減少工業對城市的污染，新建的工業區多在下風的東郊和南郊。同時政府還規定：凡是有廢氣、廢水、廢渣的新建工廠，必須要同時建設「回收和處理」廢物的裝置。一些對市民沒有什麼妨礙的輕工業如鐘錶、精密儀器、食品、服裝以及特種手工藝的工廠，則可在市中心區存在。

北京東郊的工業區形成於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最突出的是三座現代化的大型棉紡織工廠。其中國營北京第一棉紡織廠係一九五三年七月開始興建，一九五四年九月便投入生產；擁有紗錠五萬枚，自動織布機一千多台。一九五四年的勞動節前，規模更大的國棉二廠接着動工，擁有紗錠十萬枚，自動織布機二千四百台。一九五五年勞動節當國棉二廠試車時，更大的國棉三廠又相繼興建，而於一九五七年投入生產。僅是這三座棉紡織工廠，佔地便達數十公頃。因為東郊是主要工業區，故北京工人體育場也就設在這裏。這個著名體育場佔地三十六公頃，可容納十萬觀眾。

西南遠郊的重工業區以石景山鋼鐵廠和電力廠為核心，和京西煤礦連成一氣；還包括長辛店和豐台一帶的火車機車廠、橋樑廠以及周口店新建的石油化工總廠等。有一個較早的報導，說北京市一九六二年的鋼鐵產量已達二百萬噸（包括高級合金鋼）、煤一千萬噸；在西南遠郊出現了鋼鐵、電力、機械和電機製造的重工業區，以及機械、紡織和化學工廠所組成的混合工業區。這些在遠郊的工業區，已形成為衛星城市。例如石景山，就是擁有十萬工人的鋼鐵城。此一佈局，可避免北京成片市街區無限制的擴大，使人口不會過分集中。

文化教育區在西北郊，這裏有以中國科學院為首的許多全國性科學技術研究機構，⁴⁶和約五十所的高等學校，包括歷史悠久的北京大學（一八九八年創辦，舊址在內城景山東側，後改用燕京大學校址擴建）、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專為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而設的中央民族學院，以及其他如工業、農林、交通，財經、醫藥衛生等各方面的專門性學院和大學；⁴⁷形成一個嶄新的文教區，佔地約四十四方公

⁴⁶ 中國科學院原有更多的研究所，文化革命後減少到約為三十個。其中在北京的有原子能、數學、物理、力學、電子、化學、動物、地質、地理、植物、微生物、電子計算、無線電、天文、大氣物理等。在上海的有化學、生物化學、半導體等研究所，在南京有紫金山天文研究所等。在其他主要城市如武漢、廣州、昆明、長春、蘭州、烏魯木齊等也有許多分機構。

⁴⁷ 包括北京鐵道學院、北京財經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工業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林業學院、北京醫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農業大學、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體育學院以及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等。

里，約和舊北京內城的面積相等。大致科學院以東是理工科的高等院校羣，以西是文、法、財經性質的高等院校羣。疏落相隔，環境幽靜；建築結構，多式多樣。從城裏通往頤和園的兩路公共汽車，有十多個車站都以學校的名字命名。一九四九年時，北京共有大學生一萬四千人，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十二萬人。一九五九年北京大、中、小學生的總數為一百三十五萬，約佔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一九六五年北京市全部學生人數為一百七十一萬。一九七三年北京共有外國留學生三百六十四人，來自三十七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以阿爾巴尼亞居首，計四十四人，法國次之，有三十人。

文教區的西邊和著名的頤和園相接，這個原來距城十八公里的世界名園，現在幾乎已和市區連成一片。頤和園以西是香山和西山，有臥佛寺、碧雲寺等名勝；每當春暖花開時，西山一帶遊人絡繹不絕。秋天遍山紅葉，和藍色的天空配合，真是美麗無比。導源於西山的長河，向東南流過文教區，兩岸景緻幽靜，有紫竹院及玉淵潭等公園。長河將入城處之南，有北京動物園（原為萬牲園，又稱西郊公園），佔地五十公頃，有動物三百多種，兩千多頭隻，是全國最大的動物園。除大熊貓、東北虎、金絲猴、丹頂鶴、雪豹等珍禽異獸外，還有世界各國贈送來的珍貴動物。

一九五二年第一次行政區域擴充後，北京市就包進了一大片農村；一九五八年三月和十月的兩次再擴充，市區外圍的農村區就更廣大了。現在郊區的十四個縣和區，亦即遠郊的九個縣加上近郊的五個區，共有農田五百五十萬畝，折合三十六萬七千公頃，約佔全市土地總面積的五分之一。近郊以生產蔬菜為主，遠郊以生產糧食為主。一九五八年秋後，在一個極短的時期內，北京全郊區的二百八十萬農民，迅速把二千三百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爲七十六個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一年之內，連續建成了十三陵水庫（容量八千二百萬立方米）和懷柔水庫（九千萬立方米）；同時各人民公社還修建了九十多個小型水庫，使郊區實際受益的灌溉面積從一九五七年的五十八萬畝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三十七萬畝，約佔全部耕地面積 36%；擁有八萬九千匹總馬力的各種排灌機械，以及四百九十台的拖拉機。一九五九年糧食作物的春、夏播種面積達六百零七萬畝，春、夏播種蔬菜四十八萬畝，秋播蔬菜五十五萬畝。同年所飼養的雞爲四百五十三萬隻，豬爲一百零七萬頭。郊區的養豬事業發展頗快，一九七一年所養的頭數比一九七〇年增加 33.6%，平均每人分攤 0.7 頭。

郊區的國營農場，從一九五八年起也有很大發展，牛奶、豬、雞、蔬菜的生產都有所增長。此等國營農場多以生產副食品爲主，是北京副食品生產的重要基地。爲了改進

北京的都市發展

83

首都的蔬菜供應，從一九五八年冬天開始，增加了冬季溫室、陽畦蔬菜的生產，並大力推廣夏季蔬菜的栽培。故一九五九年七月份，北京市平均每日蔬菜的銷售量達到五百萬斤；冬季盛產大白菜和蘿蔔等，供應更為豐富。郊區的荒山和沙灘，也種植了果樹；例如一九五八年建立的南口農場和蘆溝橋農場，都在原先的砂石荒灘上開闢出近萬畝果園。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之間，郊區又興修了大量水利工程設施，包括五座中型水庫，二百多個小水庫、塘壩和截流，六百多處揚水站和水輪泵站，以及六千多眼機井，使有效灌溉面積達到四百七十萬畝，比一九六五年增加36%。東南郊低窪易澇，遇到大雨經常造成洪澇災害，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從一九七〇年秋後開始，十萬民工、幹部、士兵和技術人員，艱苦奮鬥兩個冬春，對幾條主要河道（海河北系上游的溫榆河、鳳河、港溝河）進行了治理，開挖、拓寬河道八十公里，築起防汛大堤一百二十五公里，修建閘、橋、涵洞等水利設施二百多處，結束了「十年九載鬧水災」的情況，改進了土地的生產力。現在全郊區水澆地面積佔耕地總面積70%以上，糧食平均畝產已超過四百斤；一九七二年雖然遇到嚴重乾旱，但夏糧仍能獲得很好收成。⁴⁸一九七三年全郊區三百萬畝夏糧作物，產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倍。一九七五年全郊區夏熟作物面積擴大到三百五十萬畝，十四個縣區普遍均衡增產，夏糧總產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長兩倍多。

到一九七三年底，北京郊區的十四個縣、區共有大、中型拖拉機三千二百台，配套農具一萬二千多台；手扶拖拉機約一萬台，配套農具三萬八千台。此外還有農用動力機械八萬台，加工機械七萬台，載重汽車約一千輛。各縣區都建立了農機修造廠，95%的

⁴⁸ 北京郊區農業最大的敵人是乾旱，1972年遇到百年罕見的大旱，1973年1-5月又沒下過一場透雨。但因水利建設有成績，特別是地下水的利用，例如在1972-73年全郊區新打機井就有5,800眼，故農業收成並不受影響。目前全郊區共有機井26,400眼，井灌總面積250萬畝。距離房山縣城關十多公里的周口店公社，不用國家一文投資，從1970年冬季開始，經過一年零八個月的努力，建成了一條盤山繞坡、跨溝越河的萬米灌渠，共鑿五個總長730米的山洞，挖填土石43萬立方米，砌石3.8萬立方米，用工228,000個。這條灌渠使全公社近60%的耕地實現水利化。1972年秋後，又在過去一直澆不上水的西南角新修了一條1,700米的沿山渠，進一步擴大了水澆地面積；使1973年一萬畝小麥全部澆上了水，全公社夏熟作物獲得了豐收。

公社有了農機修配站，三分之一的生產隊有了農機修配組，共有工人近二萬名，各種機床和農機修配設備二千八百多台。由於農業機械化迅速發展，郊區機耕面積已達到耕地總面積的六成以上；小麥機播面積更已增加到八成，機械灌溉面積佔水澆地面積73%，脫粒、揚場、加工、運輸等作業，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或半機械化。

北京郊區的蔬菜栽培，近年有了很大發展。一九七一年全郊區向北京市市場提供的蔬菜，按城市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天一·九斤。全年上市的蔬菜品種超過一百個。一九七三年全郊區有溫室八千八百間，單有塑料薄膜的「陽畦」約一千一百畝。以生產蔬菜聞名的西郊四季青公社，有菜地二萬二千畝，溫室一千三百間；從一九六六年起，每年向北京市市場提供二億四千萬斤新鮮蔬菜，佔北京蔬菜總消費量的七分之一。四季青公社因為以生產蔬菜為主，故機械化的水平也較高，在一九七〇年時就擁有載重汽車四十四輛、大型拖拉機二十八台、手扶拖拉機六十四台、排灌動力和其他動力機械七百二十五台。除蔬菜外，這個公社還向市場提供一部分豬、雞、鴨、牛奶、水果和蜂蜜等副產品；其中每年提供的商品鴨為二萬五千隻。

郊區的蔬菜生產和城市的清潔衛生存在着一定關係。北京市每當夜幕降臨，居民們便把家裏的垃圾倒在規定的地點，由清潔卡車按時收集，（收集人糞則規定在十點鐘以後）送往四季青公社等地的積肥場去。積肥場是巨大的廢物利用工廠，社員們利用垃圾中的爐灰和有機物，加以適當處理，採用高溫發酵的辦法，造出大量肥料，用以栽培蔬菜。目前北京市共有廿二個積肥場，每年積肥二百萬噸以上，供應近郊三十六個公社和八十個農場使用，成為郊區農業生產，特別是蔬菜生產的主要肥源之一。

北京市民所需要的牛乳，靠郊區的農牧場和人民公社供給。例如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就養有良種乳牛三千六百多頭，其中產乳的約佔半數。每頭乳牛平均每天可擠乳三十二公斤，最高的可達六十公斤。全公社每年約可生產牛乳一萬噸，養牛場的操作已經高度機械化。另外像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也辦有五個乳牛場，每天供應北京市二十五噸鮮乳。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是一個著名的公社，許多到北京的外賓都參觀過。它創辦於一九五八年，原只是一個普通的公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為紀念阿爾巴尼亞的解放改名為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包括六個生產大隊，下分三十八個生產隊，一九七一年時有居民二萬八千人，耕地五萬三千畝。主要生產水稻和玉米，但同時經營乳牛場、羊場、馬場、豬場、鴨場和果園。從北京飛機場進入市區道路兩旁所見的果樹林，便屬於這個公社。

北京的國際機場在東北郊的順義縣，距市中心約二十公里，一九五八年三月開始啓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北京的都市發展

85

用，佔地一萬六千五百畝，折合一千一百公頃。它有兩條跑道，能適應最大的民航機起落，每天的吐納量約三百架次。因原有建築已不敷使用，目前正進行擴建。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Peking

(A Summary)

CHEN CHENG-SIANG

Pek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lies at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great North China plain and is in the north central portion of Hopei Province. It is bounded both on the north and west by uninterrupted mountain ranges and it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in these directions depends on a few mountain passes. The east side is also a hilly zone, making transportation hardly possible. A long strip of lowland follows the northern coast of Pohai, giving access to Manchuria, but it narrows almost to nothing and invasions from this direction could also easily be checked. Th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ous Great Wall. Only the south side borders on a long stretch of open level land that extends to the southeast as far as the Pohai Gulf.

For long centuries, people in North China who wished to go to the Mongolian Plateau or the highlands of Jeho or the Liaotung Peninsula had to first pass the vicinity of Peking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their destinations on different routes and through different mountain passes.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in Mongolia and Manchuria who wished to make a journey to inland China had to first pass through those natural gates and then the vicinity of Peking before they could go south to their destinations.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 general all the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against Liaotung and Korea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Peking as the advance base. Both Emperor Yang Ti of the Sui dynasty and Emperor T'aichung of the T'ang dynasty chose to have Peking as their foremost depot in their famous military adventures in Korea. Therefore, as far as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concerned, Peking is really an inescapable point in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a fact is forcefully illustrated by the railways running now from Peking to Paot'ou, Ch'engte, Shanhaikuan and Wuhan

The place was settled at a very early time and by the era of the Warring States (403-221 B.C.), it had taken the shape of a city. The original name of Peking was Chi and for a time it was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Yen. Definit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Chi dates back to about 2,200 years ago, that is, the time when the seven powe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were contending with one another for hegemony in the China of that time.

The earliest site of Peking City, in the two millennia when it was either known as Chi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r as Chungtu during the days of the Kingdom of Chin, always centred around the original settlement east of the present-day Lienhua Ch'ih. Though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Peking

87

the size of the city kept swelling in those remote years, the original site of the city never changed. The selection of this site was obviously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the consideration of Lienhua Ch'ih and a small river rising from it.

During the sixties of the 13th century when the rulers of the Yüan Empire decided to move their national capital to Peking, the traditional site of the city east of Lienhua Ch'ih was eventually given up; instead, a new site was chosen in the northeast outskirts of the old city and a new city was consequently built. This new city was the earliest predecessor of the old portion of Modern Peking and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famous Tatu or Cambaluc, famous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medieval Europe. The decision made in selecting the new site was chiefly due to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First, though the site of the original city was ruined in wars, the northeast outlying area of the city still retained a palace in fairly good shape for the emperor on tour. Second, the problem of water supply demanded a new site. Clearly, the above-mentioned water system, limited in its supply, is serviceable in the case of a capital city in its early stages but can never meet the needs of a large metropolis. As Tatu was the political centre of a large empire, the water supplied by the Lienhua Ch'ih system was simply too little to meet the needs of a big city, let alone the needs of a huge palace complex.

Fortunately, north of this small water system was a bigger one, which, after rising from the east mountain-side of Hsi Shan, first took the form of the many springs of Yüch'üan Shan and then, flowing southeastward, was converted into a chain of lakes in the outlying area northeast of the original site of Peking. When the Chin rulers were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ungtu, this area had already been turned into a scenic place, which later saw the addition of a beautiful palace for the emperor on tour. Then, taking the lake district as a core, the Yüan rulers began to build their Tatu, a city much bigger than Chungtu. The river flowing from the lake district was then called Kaoliang Ho, which later became the water source for the north end of the Ta Yünho or Grand Canal. At that time vessels on the Grand Canal could sail directly into the lake in the centre of Tatu. This shift of the site of Peking in its earlier day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city's later development.

Here we shall see that the two greatest engineering feats in ancient China—the Great Wall and the Grand Canal—had almost a head-to-head encounter in the vicinity of Peking. Their close proximity adds splendor to the ancient city of Peking and offers also an explan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sition of the city. The Great Wall gave security to the city, while the Grand Canal serves as a channel through which important supplies (foodstuffs in particular) to the city kept flowing.

The city of Peking as we see on a small-scale map is often shown as standing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Yungting Ho. As a matter of fact, Peking is not a city facing the river but is located on the higher part of a combined alluvial plain between the Yungting Ho and the Ch'aopai Ho, the two tributaries of the Hai Ho, and even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he city's original site and river bank is no less than 14 kilometres. That Peking is not built on a river bank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one consideration: In summer the rivers running through the North China plain are apt to rise after heavy rain and as most of the river beds are unstable sudden floods caused by heavy rain are very likely to do damage to a city built on a river bank.

The imperial capitals of the several early dynasties following the Ch'in dynasty were invariably established at Ch'angan or Hsian of today. Later the national capitals gradually moved eastward, and Loyang and K'aifeng in turn became the capitals of a number of dynastic periods. The few last dynasties in China all chose Peking as the capital, a place about 910 kilometres northeast of Ch'angan. To a certain extent, Peking is to New China what Ch'angan was to the ancient Han or T'ang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represented the zenith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mperial power; yet at the close of this dynasty China was in great troubl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Great Wall lost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a time, and the Peking area was no longer the "frontier zone" as it had been up till then. Instead it became part of a northern empire, which was to expand southwards.

A nomadic tribe known as Khitan, the founders of the Liao dynasty, took Chi in 936, used it as their subsidiary capital, and called it Nanking (the southern capit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2th century, the Juchens, a semi-nomadic tribe, took over from the Khitan and founded the Chin dynasty. They penetrated deep into North China from their base in the Northeast, finally toppled the Northern Sung regime in land predominantly agricultural, and built the kingdom called Chin with its domains extending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Sunghua Chiang valley in Manchuria. They took Yen-ching, renamed it Chungtu or the Middle Capital and enlarged it to the east, west and south. It was square; each side had three gates. The imperial palace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however, remained a Han-Chinese controlled region and the dynasty ruling the South was called the Southern Sung.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Mongols wiped out Chin rule first, then the Southern Sung, and again made China a unified whole. Like the Chin, the Mongols also moved their administrative centre to Peking from Holin or Karakorum, an even more remotely located wall-town. The decision to make Peking a national capital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Chin, Yüan and Ch'ing was prompted principally by the desire to make it an advance command post, with no consider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city of Peking, displaying high attainment in the art of city planning,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long-enduring Chinese culture. The walled-city Tatu of the Yüan dynasty wa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designed in accordance with a plan complete in every detail. It had its salient features and special style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s urban centres. The planning of Tatu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ha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ncient China bodied forth, taking cognizance of actu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the ideal in construction for a national capital, and it had done this by keeping as near its goal as possible in a very creative way. This ideal design is described in a very old book *The Rites of Chou* which contains a chapter called "Notes on Construction." The story goes somewhat like this: The capital city should be a square with each side running nine *li* long and containing three city gates. In the city are nine broad roads running lengthwise and nine roads of the same breadth running crosswise, thus forming a criss-crossing street pattern. On the left (east) of the city is built an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and on the right (west) is a national altar consecrated to the gods of the soil and grain. In the front (south) stands the emperor's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long with his official residence and in the rear (north) is the commercial centre.

The designers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with this ideal in their minds, emphasized the squareness and regularity of the layout of a city, and they also took care to place the emperor's court buildings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This ideal, though originating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en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was gradually maturing, was not see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s of some of the big kingdoms in those times. Even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well unified dynasties of Ch'in and Han which fully enjoyed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this ideal was still not realiz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national capitals as Hsienyang, Ch'angan and Loyang. Only when the Yüan rulers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atu, did people se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alization of it.

The Tatu or Great Capital of the Yüan dynasty was a city of impressive proportions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Peking

89

grandeur. The city wall with its gates, the palaces, drains, streets, roads, mansions,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store-houses—all were on a grander scale than those of the Middle Capital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Chin rulers. More important than this, the Great Capital was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an elaborate architects' plan. It was, in terms of the city planning in ancient China, a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a model city.

In recent years concerted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archeologically reconstruct the Great Capital of the Yüan era. Work teams have examined the ruins of the city walls, streets, water system, and other urban constructions, and have unearthed more than ten building sites of various types. Large-scale excavation work was done especially during the post-1969 years when a building spree was going on in the city. Through extensive field checks and intensive excavations, evidenc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 regard to the outlying areas of the city and their general extent.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discoveries: The city was shaped like a square with its south and north sides a little longer than the other two sides, and the perimeter was 28.6 kilometres. Ruins over the ground of the north city wall and of the northern sections of the east and west side are now still traceable, and such ruins form what is called the "earthen wall" in the northern suburbs. The southern sections of the city wall's east and west sides correspond to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the city wall during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the south side of the wall was to the south of the present Grand Ch'angan Street. The whole city wall was built of hardened earthen blocks, and the foundation was 24 metres broad. At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all were built huge watch towers. Close to the external surface of the wall and at equidistance were constructed some beacon-mounds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city, and farther out was a broad and deep moat that girded the wall.

The streets of the Great Capital were neatly laid out, and the city folks' residences were divided into 50 *fang* or community blocks and each of these 50 *fang* had a meaningful name. Recent arc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lso show that the city streets were arranged like a chess-board, that nine main streets ran east to west and the same number of main streets ran south to north. On either side (east or west) of the main street that ran south to north were many *hut'ung* (that is, lanes in the Peking dialect) equidistantly spaced. Each main street was 25 metres wide, and each *hut'ung* 6-7 metres wide. Many of the streets and lanes in Peking today still retain traces of the streets and lanes of the Great Capital.

The life of the Yüan Empire, terminated by a rebellious ex-monk farmer named Chu Yüan-chang, stopped short of a hundred years. The new monarch called his newborn dynasty Ming. The national capital of Ming was at first at Nanking. During the war that toppled the Yüan rule, Peking suffered no great damage. Chu Yüan-chang ordered the dismantling of the palaces in Peking and had the building materials removed to Nanking for building new palaces. The motives behind this were economic as well as political. When the dismantling process was finished, only a few palace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remained intact. When Chu Ti, fourth son of Chu Yüan-chang, was made prince of Yen, he took those undismantled palaces as his official residences. When he seized power from his nephew and became the third emperor of Ming, he made Peking the national capital again. He did this because he saw the importance of defending the nation against a possible return of the belligerent Mongols from the north, and also because Peking was the base from which he could spread his power.

As Pek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no longer the natio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re,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city gradually slowed down and population decreased. When in 1370 the city wall was repaired,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wall was made to form a southward indentation to the extent of five *li* or 2.9 kilometres—a measure taken to

give a more efficient protection to the sparsely populated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city. The scantiness and the general desolate look of the northern section were principally a result of the southward shifting of the Grand Canal terminal. In 1292 a celebrated water expert named Kuo Shou-ching, by applying canal locks, succeeded in enabling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Grand Canal to extend into the city of Peking; thus food-carrying ships could sail along a smaller canal called T'unghui Ho straight into the Great Capital and could stay there mooring in a large lake named Chishui T'an north of the Imperial city. Later Chishui T'an became clogged with mud and the T'unghui Ho was also in disrepair. As a result the food-stuffs carried over the water could be unloaded only at a spot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and the situation caused the city's commercial centre to shift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eking of the Ming era was an outgrowth of the Great Capital founded by the Yüan dynasty. Because its northern part had a five-li indentation, the city in its first stage of development was much smaller than the Great Capital. Between 1419 and 1421, 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administrative buildings had resulted in an one-li outward expansion of the southern city wall, the city was still smaller than the Yüan capital. It was not until the mid-years of the dynasty, when the southern suburbs enjoyed a great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defense against a possible Mongolian invasion was again felt, that an outer wall was built. Construction of this wall was started in 1533 and completed in 1564. It was in the form of an oblong adjoining the Inner City, with walls 22.5 km in length, including 6.7 km of the southern wall of the Inner City. This explains why the whole city in later years was shaped like the figure [匚] and why the inhabitants used the words "inner" and "outer" to distinguish the two distinctive parts of the city. The total area of the two parts was 62 km², by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Great Capital.

The Inner City of Peking had three concentric parts. The innermost part was the Palatial or Forbidden City, which had a perimeter of three kilometres, and was accessible through eight gates. The second part was the Imperial City, about ten kilometres round and accessible through six gates. In this part were the residential quarters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arious yamens. The third or the outermost part was the Ching Ch'eng or the Capital City, 23.5 kilometres round and surrounded by a wall about 12 metres high. It could be entered by way of nine gates and was protected by a moat outside. All the wall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Cities and the Forbidden City were built from the best kind of specially-made bricks. At each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all of the Inner and Outer City and atop each city gate was a watch-tower or corner-loft. Now, all the city walls of Peking, excepting that of the Forbidden City, have been torn down as a part of the steps for launching an urban renewal programme.

The shape of old Peking was formed mostly in the Ming era. The northern half was the Inner City and the southern half the Outer City. A median axial line, 8 kilometres long runs lengthwise through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alves of the city and serves as the basis on which the city was once laid out. The famous T'ienanmen or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is right at the mid-point of this line. The Emperor's Palace, now the site of the Palace Museum, was also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laid in the days of the Great Capital of the Yüan dynasty. The median axial lines along which the two palaces were built were one and the same.

When Ming rule declined and was being replaced by the rising Manchu power, Peking was still fairly safe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war. Owing to a striking difference of cultural level, the Manchus were glad to take Peking as their new capital and to accept everything that belonged to it. The Manchu rulers made no alternations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Peking; if there was any effort at construction, it was made round the basis laid down in Ming years. The palace complex, for example, was only a remodelled version of the one in

the previous dynasty, yet even in this matter the layout along the median axial line still followed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Ming era.

If there was any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Manchus to Peking, it was the royal garden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In other words, this was a decorative work for the capital. In this respect the Ch'ing dynasty made numerous admirable achievements, equalling those made in the previous dynasty. Scenic spots like San Hai in the Inner City, Yüan-ming Yüan, Chang-chung Yüan, I-ho Yüan, Ching-i Yüan and Ching-ming Yüan in west suburb of Peking are all colossal masterpieces in garden architecture to the modern eye. Peking suffered from two pillages by alien troops in 1860 and 1900 respectively, and each time the targets aimed at by those troops were none other than those great royal gardens. The countless and invaluable art treasures unlawfully seized by those invaders have enriched many museum collections both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erminated Manchu rule and Peking lost its long-held position as the capital of a vast empire. In the period before 1928 Peking was in the hands of various warlords and no construction work was ever don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had been made the capital of the new republic. In October 1928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Nanking and Nanking was made the national capital. Until September 1949 Peking was renamed Peip'ing. In the 600-odd years from the days of the Great Capital in the Yüan era to the downfall of the Manchu rule, Peking as a national capital had a tardy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opulation, Peking was inhabited in 1270 by about 400,000; in 1578 by 700,000; and in 1910 by 760,000.

Since 1952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of Peking has been expanded and adjusted five times. Now it consists of nine *ch'ü* or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nine *hsien* or counties distributed in the outlying rural parts.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 metropolis is 17,800 km². The census of 1953,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country, showed how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had grown and how it was distributed. At that time the whole administrative area of Peking had grown from 777 km² to 4,532 km². The census showed the city had a population of 2,768,149, including 1,050,000 in the Inner and Outer Cities (830,000 in the Inner and 220,000 in the Outer). The suburban population, 1,700,000 strong, wa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Inner and Outer Cities. The 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city in 1953 was 611 persons per km².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s administrative area naturally led to a sharp population increase. When five adjacent *hsien* were merged into Peking in March 1958, the city's population quickly rose to upwards of 6.8 million. In March 1958, a second expansion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took place, almost doubling its territory from 4,532 km² to 8,770 km². In 1963 it was estimated at 7.3 million, and in 1974, at about 8 million.

Old Peking was a typical consumer city, yet in recent years, the metropolis has seen a phenomenal rise of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ocialist city planning is gradually turning old Peking into a productive city with modern factories and mines on its eastern, southern and far western outskirts producing steel, coal, power, machinery, instruments, chemicals, textiles and other industrial goods. The big plants each with more than 1,000 workers now number over 200. (In prewar years those plants each manned by 500 workers numbered less than ten.) Many of the abandoned suburban lots have now all been turned into industrial sites. The city's total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for 1973 was 103 times that for 1949. The self-sufficiency rate registered for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in Peking jumped from 48 per cent in 1965 to 71 per cent in 1972.

Along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 residential areas have been built around the old city. Deteriorating houses are either being renovated or torn down and rebuilt. Slums of the past have been eliminated, in their place are tall new buildings and broad clean streets.

All the dirty ditches in the city were replaced by large sewers. In the last 25 years Peking has added 20 million square metres of housing, 1.5 times the dwelling area in old Peking. Neat rows of apartment buildings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neglected grave mounds, reed-choked ponds and stinking pools.

According to city planning, Peking is expanding in all four directions from the old walled-city in the centre. Since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prevailing wind is from north and northwest, 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are located on the east and south so as to cut down air pollution in the city. Only relatively pollution-free industries such as the manufacture of clocks, precision instruments, food-stuffs and clothing and special art crafts are located inside the city. The metropolitan authority stipulates that any new factory producing harmful waste liquids, residues or gases must include installations for recovering and treating them and recycling them back into production.

Satellite towns rising in the outlying districts will help prevent unlimited expansion and over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Peking itself. Two such towns are: the growing up around the Peking General Petrochemical Works at Chouk'outien where the remains of *Peking Man*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 were found, and the other around the Capital Iron and Steel Company at Shihchingshan, 23 km west of the city centre, the terminal of the newly opened subway.

The built-up area of the city, approximately 2,100 hectares in 1949, was expanded to 7,500 hectares in 1973, and most of the new constructions were multi-storied ones. The booming industry and the improvement made in transportation also spawned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living quarters in the new suburban industrial areas.

T'ienanmen Square, the heart of the city, has expanded from its original 11 hectares to 40 hectares, big enough to accommodate half million people for an assembly or parade. The boulevard that stretches east and west with T'ienanm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has toppl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north-south median axial line that for hundreds of years has been the designers' preoccupation when they set out to do city planning for the old portion of the present-day Peking. It has also enabled the new city district to expand, method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along an axial line that extends east to west. This design has not only radically changed the layout of the city, but has also served the needs of the suburban industries that are fast growing. The east-west expansion along a new axial line,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e exclu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north-south median axial line.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ends is only that one is a new creation while the other is a sort of improvement. The new and the old meet at right angles and the meeting point is none other than the heart of the metropolis.

Viewed as a handicap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city, the majestic and imposing city wall of Peking, after a long debate, was eventually torn down piecemeal in the few years immediately after 1965. The space obtained from this wreckage was converted into a parkway, with only several city gates left as monuments to the past. The central city area has broken loose from the restraint of the old wall city, thus bringing a radical change to the urban layou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built-up area, a circular road skirting the old city was built to facilitate contact with the suburbs and to reduce the traffic volume within the city. The checkerboard pattern of roads in the old city is largely unchanged, the only major modification b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in streets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west parts of the old city—an effort made to break the partial isolation of the two part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Imperial city in former days. Outside the old city the major roads are radially arranged. The area of paved roads in Peking increased from 2.2 million m² in 1949 to 14 million m² in 1970.

The streets of old Peking ran mainly in a north-south, east-west or the so-called checker-board pattern. Few of them were broad enough and many were not connected to others. A far greater number were narrow lanes or *hut'ung*. Without breaking up the traditional checker-board pattern, the city has widened some of the streets and linked them up with new ones. The larger of these were connected to form several broad transport channels in a round-the-city pattern concentric to the walls of the old palace. These are again linked with a dozen new arteries which radiate from the city district to the newly developed outlying areas. Before the war, Peking had only 214 km of hard-surfaced roads. Today Peking has nearly 2,000 km of streets (excluding *hut'ung*) and all neatly paved. The east-west main thoroughfare, Ch'angan Street, used to end at the old city walls. Since 1958 it has been widened and leads to T'ung-hsien in the east and Shihchingshan in the west, 40 km long from end to end.

By the end of 1972 there were 194 routes on which the buses and trolley-buses ran; the operating business lines had a total length of 7,627 km. Meanwhile the total volume of passengers carried was counted as 1,180 million rides. Within the five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of 1973 the total volume of passengers carried was in excess of 20 million rides, equal to the annual total in the pre-1949 years.

The routes taken by long-distance buses that travel to the more outlying parts of the city increased from 43 in 1965 to 107 in 1972. The year 1970 alone saw an increase by 23 rout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600 km. Now between the suburbs and rural communes there is bus service everywhere except in a few villages deep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for safer traffic, some of the main streets have been divided, with the lanes in the middle for the faster-moving motor vehicles and those on either side for bicycles. Sometimes these are separated by belts of trees.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s has increased from 164 before 1949 to 2,400 in 1974, an increase of 15-fold. One special feature of the traffic in the city is that motor cars are very few and bicycles are in amazingly large numbers. By the end of 1972 the city had 1,750,000 bicycles, more than 12 times as many as the number registered in 1950.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oward evening the flow of bicycles is a marvellous sight.

Peking is the first city in China to have a subway. Construction of this underground railroad was started in 1965 and the first phase of construction was completed in November 1969. Starting at the Peking Main Railway Station, this section of subway goes west to Shih-chingshan. The total length is 23 km and there are 16 stations. All the platforms are inlaid with marble and at each station the marble is of a different colour. Scheduled runs start from 7 a.m. through 7 p.m. and in every 15 minutes there is a run. Peak velocity is 80 km per hour and the daily passenger load is between 40,000 and 60,000 persons or better than 70,000 on Sundays and holidays. Part of the city's dugout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subway.

Pek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located in Shuni, a suburban *hsien* north-east of the capital, and about 20 km away from the city centre. It was opened for use in March 1958. Daily flights, including both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number around 80. As the facilities are now incapable of meeting new needs, the airport is being expanded.

In the past, sandstorms were frequent in spring, but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been remarkably reduced from the frequency of every 3 days from 1951-1954 to the frequency of every 11.5 days from 1964-69.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large scale afforestation of the city and especially the completion of the shelter belts in the northern outlying districts. Tree-planting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1949. Every spring and autumn workers, cadres, students and other city residents plant trees in the city proper and on the nearby outskirts in support of landscape gardening. In about 10 years' time, 67,000 hectares of young trees have been plante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94

Chen Cheng-sia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Even the sand banks of the rivers are dotted with trees. In summer the whole city is a lush green and the trees give deep shade.

The old city is the core of the metropolis. Its function is mainly administrative and commercial, most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ajor shopping centres, embassies, leading hotels and theatres are located here. The northwestern suburb is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entre whe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lmost all the institutions for high education are found, including the famous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ghua University. Thus the northwestern suburb of Pek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West of this area lies the Summer Palace, also called I-ho Yüan or the Garden of Harmonious Unity, a masterpiece of imperial garden design, which was first built in 1750 as a travelling-lodge for the Ch'ing emperor. Further west the Hsi Shan and Hsiang Shan form a scenic and retirement area. The Ch'ang Ho or Long River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Hsi Shan, flows southeastward through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rea. Beautiful scenery is found along its banks which are dotted with parks. New parks and gardens, totally more than 40, many of which were built on the sites of stagnant ponds, are found in every district of the cit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